

寫作生涯回憶

張恨水



I206.6/42

写作生涯回忆

张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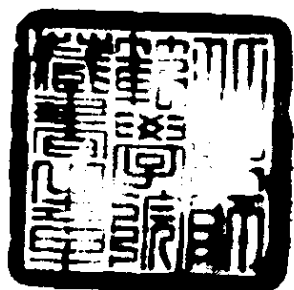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476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894765

写作生涯回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8}$ 插页 3

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19·3309

定价 0.98 元



作者像 (1956 年)

作者像
(1945年)



一弯艇子浪花翻，高歌打桨过小桥。柳花月明三径
 内，老松清话渡今宵。
 年壮萧萧数亩田，山间作伴我犁田。且将麦陇兼栽
 歌，食来明月小山行。
 微风吹水会，小小舟中泛野塘。偶在柳阴闲坐
 处，夕阳下，晚风凉。
 倚山依水五更天，红玉蒲花笑口开。湖上荷花亭子
 畔，直将香篆唤归来。

作者手迹

目 录

写作生涯回忆	1
总答谢	87

附 录:

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友鸾)	95
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张晓水、张二水、张 伍)	125
张恨水先生小说创作年表	157

写作生涯回忆

一 序 言

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有些是谎言，有些也无非是一篇广告。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朋友们让我作自传，我婉谢了。老友张友鸾以为不可，他以为我在文坛上，多少有点影响，对这点影响，不可没有一个交代。他以和我三十年知交之深，很兴奋的提起笔来，要作《张恨水论》。这篇论他打算从我三代的历史考起，小至于我写的一首小诗，都要谈谈，这心愿不可谓不宏。可是他只写了几千字，就搁笔了，因为他太忙。我自然是一笑了之，而觉得没有交代也好。

说话之间，又是四个年头。我是一切云过太空。最近，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①，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我的生活忽然起了急遽的变化，失去了平常的生活秩序。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辞去工作后，这时感到无聊，我那矛盾的心情，似乎是吃了一碟四川的棒棒鸡，除了甜，咸酸辣苦，什么滋味都有。我于是慢慢地长思了。

^① 指1948年12月12日辞去北平《新民报》工作。

人生几十年光阴，象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过去。中国人形容这个速度，是“白驹过隙”，其快可知。而我这时咸酸苦辣的境地，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中千万分之一秒，其实也可以稍稍的忍耐，让他过去。可是我又另有一个感想，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天下大事，轮不着我谈。家庭琐事，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我也犯不上去多那些事。只是一点：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对于这神交，我还愿更结下一层更深的友谊。同时，也有人对我发生了不少的误解。举一个例：在东北和华北沦陷期间，伪造的张恨水小说，竟达四、五十种之多。那里面不少是作孽的文字，把这罪过加在我身上，我太冤，我也应当辩白。于是我想到，我应当写一篇短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抄写若干份，分寄我的好友，让他们分别为我保存。说乐观点，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虽然说不祥的有些愚昧，然而总是好意，我也就算了。

前两天到报社^①，和同人谈起。同人笑说这很有趣，遗嘱式的文字，当然可以不必。不过你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个总检讨，那还不失为有意思的事，索性你写详细一点，我们拿到报上来发表，若以留材料而论，没有比在报上发表以后可留的程度更深的。我始而考虑，这是不是违反我的素志来写自传？但同人再三的怂恿，我的意志也就动摇了，我答应改变自传方式写，作为向读者写个供状。这供状是不是撒谎？是不是自我宣传的广

① 北平《新民报》。

告？我没法子深辩，敬求读者先生的批判。文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斯更无须提及。我只是写我由识字一直到现在。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谈我自己的写作，一定要谈我是怎样写起；就涉及我的读书经过了。我七岁整^①才入蒙学，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当然念的是“三、百、千”^②。我很好，念半年，就念了十三本书。你问这十三本书都是什么？我告诉你，全是《三字经》。因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念私塾。念过“上下论”^③，念过《孟子》。我除了会和同学查注解上的对子（两行之中，两个同样的字并排列着）而外，对书上什么都不理解。有一天，先生和较大的两个学生讲书，讲的是《孟子》齐人章。我很偶然的在一旁听下去，觉得这书不也很有味吗？这简直是个故事呀。于是我对书开始找到了一点缝隙，这是九岁多的事。地点是在江西景德镇，那时，我父亲在那里作点小事。

十岁，我在南昌。在一位父执^④的家馆里念书。他有两个孩子念书，另带我和一个小孩子，四个学生，共请了一位安徽老夫子（同乡）教书。那时，有新书了。如《易字蒙求》、《易字读本》之类，都带有图。我对这些带图的书，非常的感兴趣。先生并不曾和我们讲些什么，但看了这图，我可以略懂些书上的意义。后

① 这里讲的是虚岁，实龄应是六岁。

②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③ “上下论”即《论语》上下两册。

④ 父执：父亲的明友。

来我又转入一家较多的学生的私塾，有大半学生读《蒙字读本》。那书共二册，是浅近的文言，而且每课有图。我虽不读，同学读着我在旁边听着，每课都印入我的脑筋，让我了解许多事。至于我自己呢，却念的是《左传》，先生应了我父亲的要求，望文随解一遍，我实在是不懂。同时，先生又为我讲《二论引端》。这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但我还是不大懂。不过我另有个办法，同学念《论语》，带着白话解的，我借同学的看，我就懂了。

十一岁，我和父亲到江西新城县去（现在的黎川县），家里请了一位同乡端木先生，教我和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同乡子弟。正式开讲，我就了解所谓虚字眼了。但这并不是先生教的，还是由《四书白话解》那里看来的。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两个新发展：其一，是在由南昌到新城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我四叔正读着，把我吸引住了，我接过来看下去。我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学以后，我父亲桌上，有部洋装《红楼梦》，印得很美，我看过两页，不怎样注意。而端木先生却是个《三国》迷，他书桌上常摆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我就偷着看，看得非常的有味。这书，帮助我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其二，我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当然答应。但先生自己并不会作诗，除了教给我“山外青山楼外楼”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而外，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

十一岁半，我回到安徽潜山原籍，在本乡村里读书。这个读书的环境很好，是储姓宗祠附设的圣庙。庙门口一片广场，一棵大冬青树，高入云霄，半亩圆塘，围了庙墙。庙里只有三个神龛，其余便是大厅和三面长庑，围了个花台子。我和弟弟，靠墙和窗户设下书桌。窗外是塘，塘外是树，树外是平原和大山。因为我

已读过《千家诗》，对我的读书帮助不少。但先生是个老童生，一脑子八股，同学全是放牛小孩，完全和我城市的同学异趣。也惟其如此，我成了铁中铮铮了。这时，我自己有一部更好的《四书白话解》，而且有精细的图。我在图上，看懂了乘是八马拖的战车，我又了解了井田是怎么个地形。抄他一句成语：“文思大进。”因此，半年之内，除了《礼记》，我把五经念完了。先生来了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要我作八股，居然逼得我作成了“起讲”。又要我作试律诗，这就吃不消了。一个虚岁十一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平对仄，红对绿呢？我被先生逼得无法可治，只有拿了一部诗韵死翻。就这样填鸭式的，在半年之内，我搞懂了平仄。而对《千家诗》，也更觉有味了。

这一些，可以说先生没教我，全是瞎猫碰死耗子，我胡乱碰上的。而我真正感到有味的，还是家藏的两部残本小说。一部是大字《三国演义》，一部是《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另有一部《西厢记》，我却看不懂。后来，又看到一本残缺的《七国演义》，就是孙庞斗智的一幕，我也深深地印在脑筋里。不过，这时，我已懂得《左传》，也把它当故事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左传》上一些字句，可以说是那故事性的文字引动我的。

三 跌进小说圈

我在了解字义以前，是很不幸的，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先生。十三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江西，并随家回到了新淦县三湖镇。那个地方，是产橘子的地方，终年是满眼的绿树。一条赣江长时流着平缓而清亮的水，我家住在这平河绿树之中，对于我这个小文人，颇增加了不少的兴趣。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半经半蒙的私

馆里读书(经馆是教授可以作文的学生。科举时代,得读九年经馆,才有能力去考秀才),所谓“出就外傅”,我就住在学校里。这学校是家宗祠,橘林环绕,院子里大树参天,环境很好。先生姓萧,是个廪生,人相当的开通,对学生取放任主义,对我尤甚。我和三个同学,有一间屋子可读夜书。夜书只是念念古文,我非常的悠闲。同室有位管君,家里的小说很多,不断地带来看。我在两个月之内,看完了《西游》、《封神》、《列国》、《水浒》、《五虎平西南》。而我家里,上半部《红楼梦》,和一部《野叟曝言》,我一股脑儿,全给它看完了。这样,使我作文减少了错别字,并把虚字用得更灵活。六七月间,先生下省考拔贡,出了十道论文给我作,我就回家了。

父亲办事的地方,是万寿宫。我白天不回家,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抹桌子,布置了一间书房。上得楼去,叫人拔去了梯子,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作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我在楼上干些什么勾当,父亲未加干涉,也很少同学找我。约莫是两个月功夫,我自己磨练得仿《聊斋》仿《东莱博议》的笔法作文。当然,那是很幼稚的。因为用字的简练,甚至于不通。但先生出的十道论题,我全交卷了。尤其是一篇《管仲论》,交卷的时候,先生竟批

改了，让父执传观。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受不得这荣宠，因之引起了我的自满，自命为小才子。

这年冬，回到了南昌。父亲母亲回家乡了。留下我和弟妹，托亲戚照料。没人管我，我更妄为。我收拾了一间书房，把所有的钱，全买了小说读。第一件事，我就是把《红楼梦》读完。此外，我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这个习惯，倒是良好的。我在小说里，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十五岁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徐先生教我，这先生是徐孺子后代，他们家传，是不应科举，不作官的。

先生很古板，没教会我什么。只是他那不考科举，不作官的作风，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这时本已打进小说圈，专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先生又是个布衣，作了活榜样，因之我对于传统的读书作官说法，完全加以鄙笑，一直种下我终身潦倒的根苗。小说会给我这么一个概念，我很不理解。恐怕所有读小说的人，也很少会和我这样受到影响的吧？

四 礼拜六派的胚子

十五岁的秋季，父亲因我的要求，允许我进了学堂，受新教育。因为我国文还可以，我插进大同小学三年级（毕业是四年，那时高小课程，约等于现在初中二年级）。校长周六平先生，是个维新人物，他教书的时候，常常讥笑守旧分子，而且不时的叙述满清政府的腐败。我，也就是他讥笑的一个。我受着很大的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于是我除了买小说，也买新书看。但这个时候的新书，能到内地去的，也无非是《经世文篇》、《新议论策选》之类。我能找到一点新知识的，还是上海的报纸。由报纸

上,我知道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我也就另想到小说上那种风流才子不适宜于眼前的社会。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但我的思想虽有变迁,我文学上的嗜好,却没有变更,我依然日夜读小说,我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因我由《水浒》的圣叹外书上,知道《西厢》、《庄子》,是他所鉴赏的书,我又跟着看《西厢》,看《庄子》。对于《庄子》,我只领略了较浅的《盗跖》、《说剑》两篇;而对整个《西厢》,却有了文学上莫大的启发,在那上面,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

十六岁半,我考进了甲种农业学校(约等于现在的专科)。论我的年岁,是不足进那时的中学的。我冒报年岁为十九岁。我在学校里,看到同学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我私心很自傲。但是这却让我自己害了自己。除了英文,勉强可以跟得上而外,其余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没有一项不赶得头脑发昏。因之,没有时间让我再去弄文学。只有假期的时候,可以看看小说而已。这时,我有两个新发现。第一,我读《儒林外史》,对于小说的描写,知道还有这样一种讽刺手法;跟着就读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第二,我偶然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看,对于翻译的短篇小说,非常的欣赏,因之,我又继续看林译小说^①。在这些译品上,我知道了许多的描写手法,尤其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这个时候,我读小说,已脱离了故事的消遣,而为文艺的欣赏了。因此,我另赏识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

① 林译小说:流行于清末明初的林纾(琴南)译的小说。

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这个阶段，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派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后来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思想，不会脱离这个范畴，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

五 我的无名处女作^①

十七岁上半年，我已经读了几百种小说了。在亲戚朋友的家庭中，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个小说迷。我家里的弟弟们，和亲戚的小孩子们，有了空闲，就常常要我讲小说给他们听。我要卖弄我的腹笥，当然我也乐于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所爱听的，不外是神怪和武侠一类故事。关于这一类故事，我自然是俯拾即是。可是我往往随便说着，自己就加了许多穿插进去。而且我这穿插，总是博得他们赞许的。这增加了我的兴趣，我何不由我的意思，也来写一篇小说。青年人没有顾忌，也没有谁来干涉，我就开始写我第一部小说了。

这篇小说，是为弟妹们写的，当然我就写了他们最喜欢的武侠故事。这篇小说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反正有个侠字罢。

① 无名处女作写于十三岁。可参看作者其他文章。

书里的主人翁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力大无穷，使两柄一百八十斤的铜锤，犹如玩弄弹丸一般。他开始的一幕也就是完结的一幕，是使两柄铜锤，在庄前打虎。当然，老虎被这小英雄征服了的。老虎完了，这小英雄也就完了。因为我写过小说，以后才发现：写了两三天，拿来给他们讲解时，不到一小时就完了。我自己感到这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艰巨工作。我就停止没有向下写了。

我还记得，这个稿本，是竹纸小本，约有五寸见方，我用极不工整的蝇头小楷，向白纸上填塞。有时觉得文字叙述还不够劲，我特意在里面插上两幅图画。当然，我是个中学生了，多少能画几笔。所画的那位小英雄，是什么样子，我也印象不清了，只是那两柄铜锤，却夸张地画得特别大。总等于人体的二分之一。那只老虎，实在是不象，我拿给弟妹们看时，他们说象狗。这给予了我一个莫大的嘲笑，恰应了那个典“画虎类犬”了。

在这年里，我得补叙一句的，就是那位教我八股的储先生，他也来到了南昌，教我弟妹们的书。他原是教过试律诗的。他说我有诗才，劝我作诗， he 可以从旁指点。对于这，我欣然从命。但他不会写作古近体，只写得五言八韵的试律。于是介绍我读了几本试律诗集，并出了几个诗题我作。我慢慢的凑，居然可以完篇。我记得在“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题里，我有这样十个字：“枝横长岸北，树影小桥西。”储先生给我打了密圈。后来我懂一点诗，觉得这根本不合题。但我初学作诗，确是这样胡乱堆砌的。这作风，大概维持了两三年之久。

六 躐等的进修

十八岁，我父亲提议，要我到日本去留学。但我好高骛远要

到英国去。我并没有考虑到我还没有念过两册英文哩。在这个时候，我遭遇到了终身大悲剧，我父亲以三天的急病而去世了。那是民国元年秋季的事。我家完全靠我父亲手糊口吃，父亲一死，家里立刻就穷了。我母亲三十六岁居孀，下面还有五个弟妹，怎么得了呢？于是她带了我们子女，回老家潜山，靠薄田数亩过活。母亲手上没有积蓄，就再不能供给我的学费。这个打击，我实在难受，在乡下闷住了半年，只是看些旧书，又苦闷，又躁急，放下书本，整日满原野胡跑。我有一位从兄，那时在上海当小公务员，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去给我想办法。十九岁这年春天，我到了上海。这时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北移未成，设在苏州。校长是陈其美，正在招生。我因这学校与农业相近，就前去投考。考得很容易，除了一篇国文，只有两道代数，几个理化题目。榜发，我录取了。我对此事，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中学没毕业，我又跳进专门了。亲友们帮忙，凑些款，让我缴了学膳费，我就到苏州去读书。

垦殖学校，设在阊门外留园隔壁盛宣怀家祠里。房子又大又好，我宿舍窗外，就是花木扶疏的花园。隔壁留园的竹林，在游廊的白粉墙上，伸出绿影子来看人。这个读书环境，是我生平最好的待遇。不过我还是不幸，这学校经费不足，陈校长辞职了，换了个姓仇的代理。姓仇的在北京，校务根本没人负责，学校里常常停课。而我又是穷学生，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我怀念我的亡父，我忧虑我一家妇孀孤独，我更看到我前进学业的渺茫，我时常站在花园里发呆。这些愁苦无从发泄，我就一发之于诗。有时也填一两阙小令，词句无非是泪呀血呀穷病呀而已。有几个同学看到，颇为我同情，居然还结交了两个诗友呢。这里我得补叙一句的，就是在乡下半年，我自修作近体诗，并看看《白

香词谱》一类的词书。

民国初年，中、大学生的国文程度，都是很好的。大概也就由于他们都念过私塾的缘故。有人说，那个时候，青年的国文很好，科学却是不行。其实也不尽然，现在许多名教授，不都是那时的学生吗？不过思想上不如现代青年那样进步，那却是事实。在垦殖学校里，我实在还没有幻想到吃小说饭，我依然是个科学信徒。不过有些同学劝我走文学这条路，并以垦殖学校前途黯淡，劝我早作良图。可是我穷得洗衣服钱都没有，我能作什么良图呢？

七 第一次投稿

由于我穷，我也就开始自找出路。我不是喜欢看《小说月报》吗？我每月总要节省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在背页的广告上，月报有征求稿件的启事，并定了每千字三元。我很大胆的，要由这里试一试。那时学校里正因闹风潮而停课。我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作起应征的小说来。为什么偷偷地呢？就由于怕人家笑我不自量力。这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楼外是苏州名胜留园，风景很好。我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低头猛写。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竹木依依，远远送来一阵花香，好象象征了我的前途乐观，我就更兴奋地写。

在三日的工夫里，我写起了两个短篇，一篇是《旧新娘》，是文言的，约莫有三千字。一篇是《桃花劫》，是白话的，约四千字。前者说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后者写了个孀妇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邮，寄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就是寄出去了而已，并没

有任何被选的幻想。因为我对《小说月报》的作者，一律认为是大文豪，我太渺小了，我怎能作挤进文豪队里的梦呢？

事有出于意外，四五天后，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的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这一喜，几乎发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我的学问一定很不错呀！我终于忍不住这阵欢喜，告诉了要好的同学，而且和恽先生通过两回信。但是我那两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等恽先生交出《小说月报》给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是十个年头，也没有露脸。换句话说，是丢下字纸篓了。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我第一次作品流产。

八 第一部长篇

垦殖学校既是自身多故，又有个政治背景，在民国二年讨袁之后，这个学校解散了，我没钱，不能作考第二个学校打算，又回了老家。我已是真正的十九岁了。找职业，我太年轻，也无援引。务农，我没有力气，这也不是中途可以插班的。那么，就在家里呆着吧。好在家里还有些旧书，老屋子空闲的又多。于是打扫了一间屋子，终日闷坐在那屋子里看线装书。

这屋子虽是饱经沧桑，现时还在，家乡人并已命名为“老书房”。这屋子四面是黄土砖墙，一部分糊过石灰，也多已剥落了。南面是个大直格子窗户。大部分将纸糊了，把祖父轿子上遗留下来的玻璃，正中嵌上一块，放进亮光。窗外是个小院子，满地青苔，墙上长些隐花植物瓦松，象征了屋子的年岁。而值得大书

一笔的，就是这院子里，有一株老桂树。终年院子里绿阴阴的，颇足以点缀文思。这屋子里共有四、五书箱书，除了经史子集各占若干卷，也有些科学书。我拥有一张赣州的广漆桌子，每日二十四小时，总有一半时间在窗下坐着。

我为什么形容这个黄土屋子如此详细呢？这在我家庭，是有点教育性的。直到现在，我的子侄们，对于这书房还有点圣地的感想。提起老书房，他们就不好意思不念书。也就由于我在这里自修自写，奠定了我毕生的职业。我看书之外，在这里就是写作了。这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脱闷。因为当时有些乡下人的眼光，是非常势利的。他们对我这一无所成的青年，非常之瞧不起，甚至当面加以嘲笑。我已说过，我中了才子佳人的毒，而又自负是革命青年，对于乡下人那种升官发财的勉励，我实在听不入耳。然而我又形单影只，抵敌不了众人的非难。因之我就借写作来解闷。在我书桌上，有好几个稿本，一本是诗集，一本是词集，还有若干本，却是我新写的长篇小说《青衫泪》。在这个书名上，可以知道我写的是些什么。这书是白话章回体，除了苦闷的叙述和幻想的故事，却有不少诗词小品，我简直模仿《花月痕》的套子，每回里都插些词章。

十九岁的青年，又没经过名师指点，懂得什么词章？那个时候，我爱看《随园诗话》。诗重性灵，又讲率易。我幼稚万分，偶用几个典，也无非填海补天，耳熟能详的字句。把这种诗去学《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可说初生犊儿不怕虎。至于词，更是可笑。我除读过《白香词谱》而外，名人的词，没念过五十阙。这种讲声韵辞藻的东西，我怎么会弄得好？这部小说，我共写过十七回，也没有完卷。这是由于后来读书略有进益，觉得这小说太不够水准，自己加以放弃了。

这是我第一部长篇，未完成的“大杰作”。

九 失学之后

二十岁的春天，我又独自的到了南昌。因为那里还有一些亲友。青年人，不能闲散。我于是挪挪扯扯，找些款子，进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我的意思，当然还是想加深功课，去考大学。但只补习了半年，经济来源断绝，把学业放弃了。那是民国四年，九、十月间，我因为有一位族兄和一位本家在汉口，搞文明新戏和小报，我冒着危险，借了一笔川资到汉口去。

我那位本家，在小报馆里当独角编辑。我去了，他倒是很欢迎，天天让我写些小稿子填空白。我寄寓在一家杂货店楼上，我和族兄住在一处，本也很无聊，天天到小报馆去混几小时，倒也无可无不可。但又有个意外，我那种小稿，居然有人看，有人说好，虽不得钱，却也聊以快意。本来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我用了个奇怪的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当年在汉口小报上写稿子，就是这样署名的。用惯了，人家要我写东西，一定就得署名“恨水”。我的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名字本来是人一个记号，我也就听其自然。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有种种的揣测，尤其是根据《红楼梦》，女人是水做的一说，揣测的最多，其实满不是那回事。

在汉口住了几个月，毫无成就，我族兄介绍我进文明进化团演戏。这是笑话，我怎么会演话剧呢？平生没想到这件事。但主持人李君磐先生，他倒不一定要我演戏，帮着弄点宣传品，写写说明书，也就让我在团里吃碗闲饭。于是我随这个进化团到

湖南常德，又到沔县。在这团里久了，所谓近朱者赤，我居然可以登台票几回小生，我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事后想来，简直是胡闹。

二十一岁，夏季，我随进化团的人，一同到了上海。这时，有几个同乡的文字朋友，住在法租界，我就住在他们一处。那时的穷法，我不能形容，记得十月里，还没有穿夹袍子。其间我又害了一场病，脱了短夹袄，押点钱买中药吃。病好了，上海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

十 一节流浪小史

二十一岁，冬季，我又回到了故乡。这次我下了决心，不再流浪了，又在老书房里自修下去，而我写作的兴趣，却不因之减少，也就是上面那话，拿来解闷。这时写小说，我改了方向，专写文言中篇。两个月内，我写成了两个中篇，一篇是《未婚妻》，一篇是《紫玉成烟》。这两篇都是文言的。我写好之后，也没有介意，就随便放在书籍里。同时，我作了一篇笔记，叫《楼窗零草》。此外的工夫，我都消磨在作近体诗里。

二十二岁的春天，因为我族兄在上海吃官司，我受了本家之托，到上海去为他奔走一切。那时我到苏州去了一趟，遇到了李君磐先生。他有意带个剧团到南昌去，叫我和他到南昌为之先容^①。我利用了别人给我的川资，又流浪了几个月，一无所成。冬季还家。在这个时期里，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只写了一点不相干的游记而已。二十三岁的春天，友人郝耕仁，他看我穷愁潦

^① 先容：宣传、介绍引进。

倒，由他故乡石牌^①，专门写信来约我一同出游。他是个老新闻记者，那时已三十岁了。他作得一手好古文，诗也不错，并能写魏碑，我们可说是文字至交。而他又赋性倜傥不羁，这点我们也说得来。于是我就应了他的约，在安庆会面，一同东下。

到了上海，郝君有两个朋友，要他到淮安去。但谋事的前途，并无把握。而郝君却是少年盛气，不顾那些。他在上海又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要学学老残，一路卖药，一路买药，专走乡间小路，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我自然是少不更事，有他这样一个老大哥引路，还怕什么的，就依了他的主张，收拾了两小提箱药品，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郝君少年中过秀才，又当过小公务员，入世的经验，自比我多。因之，我更不考虑前途的困巨。

一路行来，由仙女庙而邵伯镇。晚投旅店，郝君还是三块豆腐干，四两白酒，陶陶自乐。醉饱之余，踏月到运河堤上去，我们还临流赋诗呢。可是这晚来了个不幸的消息，前途有军事发生。店主人也是个斯文人出身，他看到我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劝我们快回去。但是我们打算卖药作川资的，只有来的盘缠，却没去的路费，那怎么办呢？于是店主人介绍一家西药店，把我们带的成药，打折扣收买了。而且风声越来越紧，店主把我们当了祸水，只催我们走。次日傍晚，我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木船前往湖口，以便天亮由那里搭小轮去上海。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象船上统舱，

^① 石牌：今安徽潜山县石牌镇。

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会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共总只有几十枚铜元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

这次旅行，我长了许多见识。而同时对郝君那乐天知命的态度，我极其钦佩。到了上海，我就写了一篇很沉痛而又幽默的长篇游记，叫《半途记》。可惜这篇稿子丢了，不然，倒是值得自己纪念的。在这次旅途中，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而和郝君的友谊，也更为加深。到了上海，我们在法租界住了几个月。我是靠郝君接济，郝君是靠朋友接济。我们在寓楼上，除了和朋友谈天，就是作诗。有时，我们也写点稿子，向报馆投了去。我们根本没打算要稿费，都是随时乱署名字，也没有留什么成绩。由此我已知道投稿入选，并非什么难事了。

十一 写作出版之始

上面这段流浪生活，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呢？因为这和我的写作，是大有关系的。一来和郝君盘旋很久，练就了写快文章。二来他是个正式记者，经了这次旅行，大家收住野马的心，各入正途，我也就开始作新闻记者了。

我已不敢在上海过冬，上次几乎病死在上海，有了莫大的教训。在西风起，北雁南飞的日子，我就回故乡了。

这时，我更遭遇着乡人讥笑，以为我是一个绝对无用的青

年。甚至有人说读书如读得象我一样，不如让孩子们看一辈子牛。我也不和乡人深辩，我倒是受了郝君的影响，致力古文。我家有许多林译小说，都拿出来仔细研究一番。过了两个月，郝君也回来了。他写信告诉我，我写的那篇《未婚妻》，放在网篮里，没有带回，经朋友传观，十分赞美。有家无锡报馆^①的编辑，把这稿子拿去了，有心约我去帮忙。同时，芜湖有家报馆^②要他去当总编辑。但他开春要到广东去，愿意把职位让给我。我得了这消息，十分高兴，高兴得有一份职业还在其次，而我写的小说，居然有被人专约的资格，这是我立的志愿有些前途了。于是我根据《未婚妻》那个中篇笔法，再写了一篇《未婚夫》。

苦闷地在家里度过残年，凑了三元川资，由家乡去芜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和报馆^③当事人一席谈话，就约定了我当总编辑，当时就搬进报社去住。当年内地的报纸，除了几条本埠新闻，完全是用剪刀。那家报馆剪材料的，另有专人，我的责任是两个短评，和编一版副刊。副刊本来也是剪报的。我自然不肯这样干。我自己新写了一个长篇，叫《南国相思谱》，完全是谈男女爱情的。

那时我才足二十四岁，这样的小说名字，我并没有感到过于艳丽。于今想起来倒有些言之赧然了。同时，我每日写一段小说闲评。另外我找了两个朋友的笔记，也放在副刊里连载。这个举动，在芜湖新闻界，竟是打破记录的，于是也就引着有人投稿了。

居停的太太，喜欢看我写的小说，居停却赞美我的小说闲

① 《锡报》。

② 《皖江报》。

③ 《皖江报》。

评。报社除供我膳宿之外，本来月给薪水八元，因为主人高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加为十二元。我反正没有嗜好，这时又没有家庭负担，也就安居下去。

在芜湖住了两个月，觉得很闲。而箱子里只带了一部《词学全书》，一部《唐诗十种集》，又无书可看。于是我借了多余的工夫，再写小说。我先写了一个短篇，叫《真假宝玉》，是讽刺当年演《红楼梦》老戏的，试寄到上海《民国日报》去。去后数日，编者很快来信，表示欢迎。因之，我又写了一个中篇章回，叫《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也投寄《民国日报》，他们连载了将近一月，竟引起上海文坛很大注意。这两篇都是白话体，前者约三千字，后者约一万字。后来这两篇小说，被姚民哀收到《小说之霸王》的集子里去了。把我的写作印在书本子里，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民国五、六年的事，那时天虚我生^①编《新申报》的《新自由谈》，他曾征“秋蝶诗”，限用王渔阳《秋柳》原韵。我应征作了四首，录取了一部分，载在天虚我生的《苔苓录》里面。抗战时在重庆遇到陈先生，我还谈及此事，他觉得恍然隔世了。

当年写点东西，完全是少年人好虚荣。虽然很穷，我已知道靠稿费活不了命，所以起初的稿子，根本不是由“利”字上着想得来。自己写的东西印在书上，别人看到，自己也看到，我这就很满足了。我费工夫，费纸笔，费邮票，我的目的，只是满足我的发表欲。

十二 北京的初期

这是民国八年，夏初，“五四”运动发生了。当然，我受着很

^① 当时《新自由谈》编者陈蝶仙的笔名。

大的刺激。就在这运动达最高潮之时，我因有点私事到上海去，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因此我回到芜湖，那一颗野马尘埃的心，又颤动了。我想，我还不失求学的机会，我在芜湖这码头上住下去，什么意思呢？于是我一再的向社方请辞，要到北京去。社方因我待遇低廉，不肯让我走，拖了两三个月。

我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呢？因为有几个熟人，他们都进了北大。他们进北大，并非是考取的。那是先作旁听生，作过一年旁听生，经过相当的考验，就编为正式生了。这样一条捷径，我又何妨走走。自然我还是没有学杂费，但朋友们写信告诉我，可以来北京半工半读。在这年秋季，于是我把所有的行李当卖了，又在南京亲友那里借了十块钱，我就搭津浦车北上。到了北京，我是住在一位姓王的朋友那里，他是一个人住在会馆，而终日在黄寺办公，有时还不回来，就把他的房子让给我住，并给我介绍了一份职业，在一个驻京记者^①办事处那里，帮同处理新闻材料。

一切都有了安定办法了。可是所得的工薪每月只一十元，仅仅够吃伙食的，我得另想办法。那时，成舍我君在《益世报》当编辑，他就介绍我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月给薪水三十元。说是助理编辑，其实是校对，我的职务，乃是看大样。后来看大样的又增加了一个人，工作减少了，月薪也减少了，减为二十五元，在驻京记者那里，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在《益世报》是晚间十时到天亮六时，我的休息时间，是那樣的零碎而不集中，我的睡眠时间，也就是片断的几小时。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

^① 指秦墨晒，当时为《时事新报》拍发新闻电报。

这样有一年之久,《益世报》调我为天津版通讯员,薪水补足了三十五元。同时,在驻京记者那里,薪水也增加到三十元,我的收入是加了。除了伙食,实在花费不了。于是我除了每月寄一部分款子回家而外,我又有钱买书了。这时,我对词,有了更深的嗜好,买的书,也以词类为多。工作之外,我在会馆里休息,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于是我又转了个方向去消磨工余时间,进了商务印书馆的英文补习学校。

在工作那样忙碌的时候,我还要去自修英文,朋友们也都笑我是牛马精神。可是我也想着,我若不这样干,我形单影只的在北京,又怎么去安排我的时间呢?也就为此,我没有写较长的文稿。到北京来的初期,可以说我完全是机械地作着新闻工作。

十三 新闻工作的苦力

在北京的第二年,芜湖有家报馆^①约我替他写篇小说。我就以当时安徽的自治运动,写了一个上八万字的长篇,叫作《皖江潮》。这部小说,特别地带着安徽地方色彩,在他省人看来,是会减少兴趣的。所以那篇小说能登在报纸上也就算了事,并无任何出版计划。但芜湖的学生,却利用了这小说里的故事,一度编为剧本,并曾公演。我的文字搬上舞台,这要算是初次了。

因为前两年,我在《民国日报》投稿的缘故,在通信上,我神交了几位文人。他们反正是离不开副刊和小报的,也就常有信来,约我写些散稿。可是当年上海那地方,除了几家大报馆,给稿费是没那回事。纵然特约你写稿子,那稿费也极其渺茫。那

^① 《皖江报》。

些朋友约我写稿，都曾出到两元钱一千字，其始，我也觉得不无小补，很努力地写了稿子寄去。而且化名是多多益善，以便一天刊出好几篇。然而我始终没有接到过什么稿费，至多是寄些邮票来，我也就兴味索然了。

不过在新闻工作上，我却是成日的忙。除了那个驻京记者办事处之外，我自己也担任了两份新闻专责。一份还是和天津《益世报》写通信，一份是芜湖《工商日报》的驻京记者。由上午九点钟起，到下午五、六点钟止，我少有空闲的工夫。由民国八年秋季起，到民国十年冬季止，我就这样忙下去。其间只是十一年的旧历年，我回了一趟芜湖，探访母亲，此外没有离开北京。因为我为了弟妹们念书，已托二弟把家眷送到芜湖住家了。我是个失学青年，我知道弟妹们若再失学，那是多大的痛苦，所以我把在北京得到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工夫，再去搞什么文学。

十四 通讯文字收入甚丰

十二年，我的新闻工作，格外加忙了。在一家通讯社^①当总编辑，也就住在这通讯社里。那待遇是可笑的，每月只二十几元。我因为有房子住，有水电供应，所以乐于接受。不过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的组织，现在几乎令人不相信。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请问，我这总编辑是怎样的当法呢？我没有那胆量天天造谣，我也不能把我所

^① 北京“世界通讯社”。

得的一点新闻，全部送给通讯社。我得了社方的谅解，只是找些内地各省来的报，改头换面，抄写几段。这自然是不忠实的。但绝对没有造谣，倒也问心无愧。干了几个月，我决计不干这闭门造车的新闻，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里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

这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讯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于是我认识了几位名记者，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约我写通讯。这两家报馆，对于北京通讯，极肯花钱，一经取录，每篇通讯拾元。材料好，写上篇通讯，是不会费一小时以上的工夫的。我也为了人家的报酬丰厚，抱定不拆烂污主义，有材料才写，没有材料决不敷衍成篇。而且写的时候，将一篇文言，总写得它十分清楚流利。于是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讯，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至于我的署名，也不下七、八个，现所记得的，就只有一个“随波”。

十五 关于《春明外史》（一）

在我生活转好的时候，我也很想减少我的工作，以便抽些工夫出来读书。可是我的家，已经由乡间转入城市，而弟妹们又都进了学校，我的负担，却逐渐的加重，自己考虑之下，工作还是减少不得。于是我到北京来读书的计划，经过三年的拖延，只得完全放弃。相反的，益发就钻进工作圈子，多作些事。这期间，我曾与成舍我君两度合作，一度是《今报》，一度是“联合通讯社”。但时间都不久，工作又停止了。最后，成君在手帕胡同办《世界

晚报》，又约我和龚德柏君共同合作。起初，我们都是编新闻。副刊叫《夜光》，由余秋墨编辑。成君已知道我在南方很写过几篇小说，就要我给《夜光》写个长篇。这原是我最高兴作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任何条件，就答应了写。又由于民国初年，许多外史之类的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就把我写的小说，定名为《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我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故事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当然，所写的社会的现象，决不能是超现实的，若是超现实，就不是社会小说了。因之这篇稿子，在《世界晚报》发表以后，读者都还觉得很熟识，说的故事中人，也就如在眼前。而这篇小说也就天天有人看。

这给予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更用心的向下写。余秋墨君另有专职，《夜光》只编了一个月，就转交给我了。于是我编副刊兼写小说，把《世界晚报》的新闻编辑放弃。我虽入新闻界多年了，我还是偏好文艺方面，所以在《世界晚报》所负的责任，倒是我乐于接受的。加之晚报创刊之时，我和龚君，都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对于前途，有个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后来吴范寰君加入，也是如此。

这与写作好象无关，其实关系很大，因为我们决不以伙计自视，而是要共同作出一番事业的，所以副刊文字和小说，都尽了自己能力去写。

《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词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既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的，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求其词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往往两个回目，费去我一、二小时的工夫，还安置不妥当。因为藻丽浑成都办到了，不见得能包括小说最高潮。不见得天造地设的就有一副对子。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因之这个作风，我前后保持了十年之久。但回目作得最工整的，还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其它小说，我就马虎一点了。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词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不过，我又何必本末倒置，在回目上去下工夫呢？

十六 关于《春明外史》（二）

《春明外史》写到十三回的时候，我就作了个结束，约莫是二十万字。为什么用奇数来结束呢？这也是我故意如此。人家说

十三是个不祥的数目，我偏要这样试试。不过事后想来，那又何必？文字应该到那里结束，就在那里结束，拖长缩短，都没有道理。这十三回作完了，本来也可以不写的。但社会小说，象《官场现形记》似的，结束了再起楼阁，也并无所谓。而《春明外史》的主角，我又没将他的行为结束，续下去更不困难，所以我又跟着写二集。在写二集的时候，许多朋友，怂恿我将第一集出版。二弟啸空，他并愿主持发行，于是我就筹了笔款子，把书印起来。那时，我并没有多大的指望，只印了一千多本，事有出于意料的，仅仅两个月就销完了。

《春明外史》发行之后，它的范围，不过北京、天津，而北京、天津就有了反应的批评。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章回小说还可以叫座，这是奇迹。也有人说这是礼拜六派的余毒，应该予以扫除。但我对这些批评，除了予以注意，自行检讨外，并没有拿文字去回答。在“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新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做“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派不派的问题，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还是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

在写《春明外史》二集的时候，《世界晚报》又出了日报。副刊《明珠》，归我编辑。社方又要我写个长篇。因为当时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他对于《斩鬼传》极力推崇，劝我作一篇《新斩鬼传》。我一时兴来，就这样作了。这篇小说，虽根据老《斩鬼传》而作，但《斩鬼传》的讽刺笔法，却有些欠含蓄，我也是如此。后来这个书出版过了，沦陷期间，被上海文人删改过，更是有些走辙了。

同时，我给北京《益世报》，也写了个长篇，叫《京尘幻影录》。这部书，完全是写北京官场情形的，开始我也很卖力的写，到了后来，很不容易拿着稿费，我就有些敷衍了事。但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多，总有五十万字以上。这部书，我没有留底稿，也没有剪报。事后很想收回来重新修改，但已不能找补全份了。

这两个长篇，都是我写了《春明外史》，才被人约我写的，而我的全家，那时都到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已不是我早两年为发表欲而动笔了。所以没有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所以这两部小说，我都认为不够尺寸。不过我对《春明外史》，要保持已往的水准，却是不拆烂污。约是一年多的时间，又写完十三回。这算是第二集。第二集的主要人物，有许多未了的公案，我又不能不跟着写第三集。在写第三集的时候，那时是吴范寰君当经理，他合并一、二集，由社方出版，销行之后，以公平的办法，给予了我的版税。在这里我必须补叙几句的，就是这几年间，我始终在世界日、晚报供职，并曾一度任日报总编辑。有道是树大招风，对《春明外史》的批评，就比以前多了。当然有一部分是对该书加以欣赏的，而竭力攻击的，也在所不免。但这里有一个意外的遇合，就是提倡新文艺的《晨报》，也约我给他们写个长篇。于是我为他们写了一篇《天上人间》。《天上人间》，我是用对比法写的，情、景、事我全用细腻的手法出之，自视是用心写的。因为《晨报》停刊，这篇小说没写完。后来无锡《锡报》转载，我又续了几回，中日战起，终于是不曾写完。直到去年，上海书商，还有约我写完的要求。情过境迁，我又太忙，这部书将来是否可以搞完篇，我自己还不能知道。不过以全书布局言，所差不过是十分之二、三，搞完它，倒也并非艰巨工作。

十七 关于《春明外史》(三)

《春明外史》第三集写完的时候,大概是民国十八年,由十二年夏算起,共是七个年头,约莫是五整年多。全书告竣之后,《世界日报》又合并出版全集,共是三十九回。第一集约是二十万字弱,第二集约三十万字,第三集有三十多万字,合起来共九十多万字。回目是由第一到第三十九回,每回的回目,全是十八个字。后来我把这部书的版权卖给世界书局。根据历年人家的批评,将书里的错误加以修整,并把每回的字数,划分整齐,除了分集的办法,就是现在印行的这个样子。当然回目也都改了。回目文字的工整,因改得太仓促,不及原样,但包括文字里的高潮,却又更恰合些。

《春明外史》里的人物,后来有许多人索隐,也有人当面问我,某某是否影射着某人。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决不是原班人马。这有个极好的证明。例如主角杨杏园这人,人家都说是我自写。可是书中的杨杏园死了,到现在我还健在。宇宙里没有死人能写自传的。

这部书,自是我一生的力作之一。但我自视,不能认为我的代表作。第一,我的思想,时有变迁,至少我是个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春明外史》主干人物,依然带着我少年时代的才子佳人习气,少有革命精神(有也很薄弱)。第二,以几个主干人物,穿插全书。我也不妄自菲薄,是费了一番心血的。但主角的故事,前后疏落在一百万言的书里,时隐时显,究非良好办法。

第三，有些地方，欠诗人敦厚之旨。换言之，有若干处，是不必要的讽刺。第四，我太着重那一段的时间性。文字自不能无时间性，但过于着重时间性，可以减少文字影响读者的力量。

在《春明外史》全书写完之后，我已写了十年的长篇，在社会的人海里，多少激起一点溅沫。因此，约我写小说的人就加多起来。同时，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由这部书发展开来，引人注目之作，有两部书，一是《金粉世家》，一是《啼笑因缘》。为了读者容易清楚，还是用这节文字的传记体，而不走编年的路子。顺着次序，我先谈谈《金粉世家》，再谈关于《啼笑因缘》。

十八 《金粉世家》的背景

这是人人要问的，《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那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象，却又不全象。我曾干脆告诉人家，那家也不是！那家也是！可是到现在，还有人不肯信。但这些好事的诸公，都不能象对《春明外史》一样，加以索隐了。

我根据写《春明外史》的经验，知道以当时人，运用当时社会背景写小说，要特别加以小心。写小说的人是信手拈来，并无好恶，而人家会疑心你是有意揭发隐私的。小说就是小说，何必去惹下文字以外的枝节。所以我所取《金粉世家》的背景，完全是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怎么能作为背景呢？再换个譬喻，乃是取的蜃楼海市。蜃楼海市是个幻影，略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虽然是幻影，但并不是海怪或神仙布下的疑阵，它是太阳摄取的真实城市山林的影子，而在海上反映出来。那和照像的原理，并无二致。明乎此，就知道《金粉世家》的背景，是间接取的事实之

影，而不是直接取的事实。所以当时小说在报上发表的时候，许多富贵之家的人，尤其妇女，都拿去看看。而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说的是谁。老实说，这也就是写小说的一种技巧。我不敢说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手腕，而布局之初，实在经过一番考虑的。

有人说，《金粉世家》是当时的《红楼梦》，这自是估价太高。我也没有那样狂妄，去拟这不朽之作。而取径也各有不同。《红楼梦》虽和许多人作传，而作者的重点，却是在几个主角。而我写《金粉世家》，却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家”上，主角只是作个全文贯穿的人物而已。就全文命意说，我知道没有对旧家庭采取革命的手腕。在冷清秋身上，虽可以找到一些奋斗精神之处，并不够热烈。这事在我当时为文的时候，我就考虑到的。但受着故事的限制，我没法写那种超现实的事。在《金粉世家》时代（假如有的话），那些男女，除了吃喝穿逛之外，你说他会具有现在青年的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小说有两个境界，一种是叙述人生，一种是幻想人生。大概我的写作，总是取径于叙述人生的。固然，幻想人生，也不一定就是超现实，如《福尔摩斯侦探案》，《鲁滨逊漂流记》之类，那是有事实铺叙的幻想，并不是架空而来。但写社会小说，偏重幻想，就会让人不相信，尤其是写眼前的社会。《金粉世家》，我是由蜃楼海市上写得它象真的，我就努力向这点发展。于是那里面的教育性，只是一些事情的劝说，而未能给书中人一条奋斗的出路，这是我太老实之处。也可以说，我写着这一、二百人登场的大戏，精疲力尽，已穷于指挥，更顾不到意识上的加重了。

十九 《金粉世家》的出路

《金粉世家》的重点，既然放在“家”上，登场人物的描写，就不能忽略那一个人。而且人数众多，下笔也须提防性格和身份写的雷同。所以在整个小说布局之后，我列有一个人物表，不时的查阅表格，以免错误。同时，关于每个人物所发生的故事，也都极简单的注明在表格下。这是我写小说以来，第一次这样做的。起初，我也觉得有些麻烦。但写了若干回之后，自己就感到头绪纷如，不时的要去检阅旧稿，就迫得我不能不那样办。

全书的架子既然搭好，表格也填得清楚了，虽然这部书的字数，已超过一百万，但也未见得有什么难写。在我写完之后，对于书销行的估计，我以为是在《春明外史》之下的。可是这十几年的统计，《金粉世家》的销路，却远在《春明》以上。这并不是比《春明外史》写得好到那里去，而是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近有味。尤其是妇女们，最爱看这类小说。我十几年来，经过东南、西南各省，知道人家常常提到这部书。在若干应酬场上，常有女士们把书中的故事见问。这让我增加了后悔，假使我当年在书里多写点奋斗有为的情节，不是给女士们也有些帮助吗？而在现在情形中，这书是免不了给人消闲的意味居多的。

《金粉世家》在报上发表的时候，我对于每回文字长短方面，没有加意经营。有时一回长过两万字，印起书来，就嫌着太长，而和那几千字一回的，也悬殊太甚。所以在全书付印的时候，我也是经过一回修剪整理的。有了这个教训，自后我在报上陆续发表长篇，就先顾全到了这一点，借以免掉一番事后修理的功

夫。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

把这些零碎交代过了，再总结几句。这书将来所得的批评如何，我不知道。若就这十几年的经过而论，它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奖许，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指摘。它唯一被人所研究的，就是这些人物隐射着是谁？而在不声不响的情形下，这书的销行，在我的写作里，始终是列于一级的。它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这是奇怪的。记得当年这书登在报上，弟妹们是逐日念给家慈听，也是数年如一日的。这一部长篇，它出现以后，出路是这样的。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而这样的题材，自今以后的社会，也不会再有。国家虽灾乱连年，而社会倒是不断进步的。

二十 《啼笑因缘》的跃出

我在北方，虽有多年的写作，而在上海所发表的，却是很少很少。上海有上海一个写作圈子，平常是不容易突入的，我也没有在这上面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民国十八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北上，我认识了一班朋友。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

我想，象《春明外史》这样的长篇，那是不适于一个初订契约的报纸的。于是我就想了这样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明星公司拍电影，拍电影能拍出六集，这出于我始料）。稿子拿去了，并预

付了一部分稿费。不过《新闻报》上正登着另一个长篇，还没有结束。直等了五个月，《啼笑因缘》才开始在上海发表。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的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我觉得这并不过分神奇。但后来批评《啼笑因缘》的，就指着这些描写不现实，并认为我决不会和关寿峰这类人接触。当然，我不会和这类人接触。但若根据传说，我已经极力减少技击家的神奇性了。

在此之外，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的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当然我还是一贯的保持缄默。我认为被批评者自己去打笔墨官司，会失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而徒然扰

乱了是非。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作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它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的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二十一 北平两部半书

《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发表，是由十八年到十九年。在这期间，我在北方，还有其它的写作。始而为《新晨报》写了一篇《满城风雨》，那是对于内战，加以非议的。书完了篇，后来由上海一家书局，将版权买去了。同时给《朝报》写了篇《鸡犬神仙》，因为该报不久改组，我也就中止了。倒是另有个小玩艺，后来也出了版，这却非我所料及。就是那个时候，真光电影院的文书股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出有一种宣传品的画报，拉我写篇小说。我就每期给他们凑写几千字，聊以塞责，书名是《银汉双星》。大概写完是十回，写完了也就完了。不知怎么落在上海书商手里，也就出了版。后来有人说，这书也是伪的，这个我倒不能不承认出自我的手。

二十二 《斯人记》

在写《啼笑因缘》的时候，《春明外史》，完全在《世界晚报》发表完了，报馆方面，要我再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东西。当然，这种题材，在北平是不难找到的。我当年又年富力强，也并不

不感烦腻。老实一句话，写的时候，无论拿到多少稿费，写完了我可以拿去出版，就是一笔收入。我完全看在收入上，又给《世界晚报》写了一篇《斯人记》。

《斯人记》云者，是根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意思下笔的。这书里以两个不能追随时代的男女为主角。他们都是爱好文艺者，却因为思想上不能彻底，陷于苦闷的环境中。书也就以苦闷来结束。在全书里，枝枝叶叶，仍然涉及北京的社会。但这里和《春明外史》有些不同的，就是所涉及的角色，他们大致得看婚姻圆满的结果，以反映主角的无结果。书共是二十回。写完后，并没有如我预期出版，直到民国二十五年，才由《南京人报》出版，那个《南京人报》，就是我拿稿费办的。容后文再说。《斯人记》想不出什么特色。只有一点，我写的楔子，是个南曲散套。于今想起来，虽出于游戏，未免开倒车了。

二十三 《春明新史》

在民国十九年的岁首，我到东北去游历一次。事先，沈阳出版了一张《新民晚报》。主持的人，全是我的朋友。他们要我写一篇《春明新史》。我觉得《春明外史》这一类小说，一再的向下续去，实在没有意思，没有答应写。但朋友不得我的同意，却发出了预告。我因情不可却，只好答应写。

《春明新史》的写法，自然和《春明外史》一样。但我对这书，自始就不感到兴趣，并没有象《春明外史》那样，有个预定的计划，去安置些主干人物。随意想，随意写。也许读者在故事里看到些很有趣的描写，然而我并没有费多大的精力，虽不致于敷衍成篇，我并没有对它寄予多大的希望。但我到底还是把它写完

了，也是二十回。后来这书有上海某家小报转载，干脆我就把版权卖给他们了。不久，也就出了书。

我当时也曾和上海书商说过，我的写作，应该让我自行检讨、订正，这样胡乱出书，那是不好的。而他们的答复也妙，他说，用不着订正，你的小说，总会够水准的。其实，他们心里的话，并不是如此，乃是印出去，可以卖一笔钱就行。

二十四 世界书局的契约

这件事，是文坛上的谈话资料，小报上有人形容得神话化，说我在十几分钟内，收到了几万元稿费。跟着就向下说，我拿这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部汽车。这简直是梦呓。中国卖文为活的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去如此，将来亦无不然。故事是这样的：

这年秋天，我到了上海，小报上自有一番热闹。世界书局的赵苕狂先生，他约我和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谈谈。我当然乐于访晤。第一次见于世界书局工厂，约有半小时的谈话。他问我还有什么稿子可以出售的。我就告诉了他《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而《金粉世家》，那时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写完呢。他说，你这是出过版的，登过报的，不能照新写的作品算，愿意卖的话，可以出四元千字。我说，容我考量。第二次，沈君请我到“丽查”饭店吃饭，约苕狂君作陪。极力劝我把两部书卖了。据我估计，两书各有一百万字。沈君愿意一次把《春明外史》的稿费付清。条件是我把北平的纸型交给他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分四次付，每接到我全部的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交我一千元。我也答应了。同时，他又约我给世界书局专写四部小说，每三月交出一

部。字数约是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稿费是每千字八元。出书不再付版税。当时我以家庭里有几笔较大的费用，马上有一笔完整的收入，与我的家庭，有莫大的好处，我也就即席答应了。问题的确解决的很快，连吃饭带谈天，不到两小时。至于十分钟成交，不但沈君一位大经理，不能那样荒唐，我也不能如此冒昧呀。

次日，赵苕狂君代送了合同来，让我签字，交出四千元支票一张。这就是小报上说我要王府的那笔款子。契约以外，赵君又约我和《红玫瑰》杂志，写一个长篇。《红玫瑰》也是世界书局出的半月刊，就由赵君主编。为了尊重介绍人，当然我也就答应了。以后我给《红玫瑰》写的是《别有天地》，是篇讽刺小说。而给世界书局的小说，我只交卷了三篇，而且拖了一年多。那三篇小说是《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上两部各三十二回，后一部二十四回。他们的稿费，倒是按约付给我的。因为我交稿子延期，稿费自然也延期，所谓数万元的巨大稿费，其实不过一万数千元，而且前后拉长了两年的日子，谈不上发财。不过在当年卖文为活的遭遇说起来，我这笔收入，实在是少有的。

二十五 加 油

我由上海回来，手上大概有六、七千元，的确不算少。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①，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

①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

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俱，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作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听戏，看电影，吃小馆子，当年是和朋友们同俱此好的，倒不等这笔钱来办。我所说的消遣，是以下三件事：一、收买旧书，尤其是中国的旧小说。二、收买小件假古董。怎么会是假古董呢？这个我和古董专家异趣。我以为反正是玩物丧志，玩真古董，几十几百买一样，是摆在那里看的，花个两三元，也是摆在那里看看，这有什么分别。而且买真的也未必不假。三、是我跑花儿厂子，四季买点好花。除了买书颇是一个不菲的开支，其余倒也无所谓。这时，我可以说是心广体胖，可以专门写作了。

这是民国二十年吧？我坐在一间特别的工作室里，两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围着。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加油的工作不错，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十^①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余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我的英文，始终是为了忙，而不能耐心去自修。有时拿到一本英文杂志，意识到里面有很多精神食粮，可是我又不能消化它。于是我进修英文的思想又砰然欲动了。有朋友给我介绍一位老先生，每天可以教我半小时英文，我欣然的要聘请他。但家

① 一九二一年。

中人一致反对，说是八十岁学吹鼓手，来不及了。而且我的脑子也够使的，不能再去消耗脑汁。我一松懈，这个计划就告吹了。于今还深引为憾。

这时，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类的东西，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象苦修的和尚，发了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种书，不是在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搜罗到材料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那些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我就得去多转旧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功夫就揣些钱在身上，东西南北城，四处去找破旧书店。北京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肯下功夫，总不会白费力的。所以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我在宣武门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字样，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简直是一宝了。这一些发掘，鼓励我写小说史的精神不少。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祸，一切成了泡影。不过这对我加油一层，是很有收获的。吾衰矣，经济力量的惨落（我也不愿在纸上哭穷，只此一句为止），又不许可我买书，作《中国小说史》的愿心，只有抛弃。文坛上的巨墨，有的是，我只有退让贤能了，迟早有人会写出来的。

二十六 武侠小说的我见

人有所能，有所不能，写社会小说，就写社会小说，其实不必

写以外的题材的。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那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

我写武侠小说，是偶然的反串，自不必走别人走的路子。所以这部《剑胆琴心》里，没有口吐白光，及飞剑斩人头之事。我找了些技击书籍，作为参考，全书写的是技击一类的事情。把我家传的那些口头故事，穿插在里面作了主干。当然，无论写得怎样奇怪，总不会象《封神榜》那样热闹。我又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奇禽异兽方面去找办法。如我描写蜀道之难，就插一段猿桥的描写。这是屡屡见于前人笔记的，而且也不违背科学。意识方面，我就抓着洪杨革命后的一点线索，把书里的技击家变为逸民。这自然比捕快捉飞贼，飞贼打捕快有意思些。可是事后想来，那究竟近乎无聊。这里的叙述，怎样的就可能性上去描写，总难免架空。父老口头上的传说，那究竟是靠不住的。若说这里面也可以带些侠义精神的教育性，而这教育性，也透着落后。

我的见解如此，并不是说武侠小说不可写。若不可写，司马迁怎么也作《游侠列传》呢？但“侠以武犯禁”，在汉以前就如此，汉以后的国粹游侠，是变了质的。一部分变成秘密结社，一部分变神道设教，再一部分变了升官发财的捷径。中国的游侠，诚然是和技击不可分。但游侠者流，不一定个个就有高明的技击。这种趋势，在明末清初的社会里，反应的很清楚。所以在清朝中叶，那时候的武侠小说，多少还有些真实性。到了火器盛行于国

内以后，技击已无所用之，游侠者流，社会每个角落，诚然还是有，而靠他一点技击本领，已不能横行江湖了。所以真要写游侠小说的话，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倒真有奇奇怪怪及可歌可泣的故事。但还是那话：“侠以武犯禁”，非文人可以接触，纵然接触，也不敢写。

往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帮会，也很有兴趣去研究，写出文字来，却都是隔靴搔痒之谈。在国人自己，就很少为这个出专书的。因为越知道详细，越不能下笔，怕得罪了人。若以圈子外的人去写小说，那是会让人家笑掉牙的。因之社会上真的游侠，没人会写，没人敢写。而写出来的，就全不是那回事了。

国人的武侠小说，既不敢触到秘密结社，所以写得好，不是写神道设教的那些人，就是写升官发财的那些人。而这两路人，就全不是司马迁说的朱家、郭解者流。写得不好，我就也不必多说了。就以写的好而论，这在意识方面，也教作者很难下笔。小说而忽略了意识，那是没有灵魂的东西，所以我对武侠小说的主张，兜了个圈子说回来，还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因此，我生平就只反串了两次，而这两次都决不成功。好在是反串，不成功也无所谓。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

另外，我有一部武侠小说，叫《中原豪侠传》，那是后若干年，在《南京人报》发表的。故事是说晚清王天纵这类人物，那是河南朋友告诉我的。这书后在重庆出版。其实这已不是纯技击小说，而是一个故事的演化。顺便附带报告于此。

二十七 忙的苦恼

在民国十九至二十年间，这是我写作最忙的一个时期。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所以我在可以凑付的情况下，总是给人家答应写。就以二十年开始说，当时，我给《世界日报》写完《金粉世家》，给晚报写《斯人记》，给世界书局写《满江红》和《别有天地》，给沈阳《新民报》写《黄金时代》，整理《金粉世家》旧稿，分给沈阳东三省《民报》转载。而朋友们的特约，还是接踵不断，又把《黄金时代》，改名为《似水流年》，让《旅行杂志》转载。我的慈母非常的心疼我，她老人家说我成了文字机器，应当减少工作。殊不知这已得罪了很多，约不着我写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这样的忙法，有了一年，而北平《新晨报》又改组。主持人全是极好的熟友，没法子，我给写了一篇《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后文再说。由这些事情类推，我的忙，是无法减少的。我曾自己再三打算，怎样可以躲去这些文债。始终找不到一个良策。不久，“九一八”国难发作，新约才少见来。记得这一年中，人家问我情形怎么样，我的答复是苦忙，而这份苦忙，日本人都为之注意。记得某文人到日本，日本人正式问他，张恨水发表的写作为什么那样多？我知道，这可以让人家误会，我是一个唯利是图，

粗制滥造的文人，但我为了少写，被人损骂的情形，有谁了解呢？

就文字批评我，我是始终乐于接受的。记得有一册前进的杂志，在某一期，由第一页至最后一页，几乎全是骂张恨水。朋友寄给我看了，我倒很钦佩，有些地方，骂得我是很对的，我正可以予以改进。象《论语》杂志上也挖苦我，我就一笑置之。我觉得他们并不比我前进着多少。至于那些小报，就骂得我啼笑皆非了。有人说，我的写作，全是假的，有一老儒代为执笔。也有人反问，这老儒为什么不出名，一切便宜张恨水呢！他们说另有秘密。也有人说，小说是我作的，但不是我写的。学了外国办法，张恨水说，别人写。这样代写的人，共有三位之多。更有人说，我写小说，是几个人合作，由我一个人出名，得钱瓜分。甚至还有人说，有一位女士代我写小说，她不便出名。张恨水本人，根本狗屁不通。我看到这些黄色记载，除了发笑，简直不能作一个字的辩白。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合了那句俗言，“人怕出名猪怕肥”。社会上名字老被人提着的，多是盛名难副，而我尤甚！我少应酬，卖剪刀又必写出“真正王麻子”不可，其必给小报添些材料，倒也似乎是理有固然了。

二十八 《新闻报》的续约

这里要回忆到我和《新闻报》的继续契约。在《啼笑因缘》登完以后，因事前的接洽，《新闻报》又登了一篇武侠小说。但这时的武侠小说，已经不大合乎上海人的口味了。所以不等那小说登完，独鹤就再三的写信给我，要我再写一篇，而且希望长一点的。我因为中国连年苦于内战，就写了一篇《太平花》。这小说的意识，在题目上，是可以看的出来的。但也有我的苦处，那时，

我既住在北平，这里也脱离不了内战的圈子，下笔不能不慎重考虑。因此，我写的内容，地点，人名，时间，一齐给它一个含混不清，大概的说，就是前两年的事，地点是在黄河两岸吧？

二十九 《太平花》

这样，就不会触犯到谁了。故事是写人民流离之苦，而穿插着一段罗曼斯。不料写到了一半的时候，“九一八”事变。这时，全国的人民，都叫喊着武装救国，我这篇小说是个非战之篇，大反民意，那怎么办呢？而《新闻报》的编者也同有所感，立刻写信给我，问何以善其后？我考虑着这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书里的意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跟着说抗战。第二，干脆，把这篇腰斩了，另写一篇。考虑的结果，还是采取了第一个办法，说到书中主角，因外祸突然侵袭，大家感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陡然一个转变，自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而全书的故事，也不能不大为改变了。后来书作完了，自己从头到尾，审查过一遍，修订过一遍，居然言之成理，二十二年，也就出版了。抗战期间，后方也要出版，但到出版的日子，日本人又投降了。在日本人又投降之后，我们还要提倡战争，也觉得不对。于是我又来了个第二次订正。三十四年，我到上海，将订正本交给书局，言明以后出版，以此为准，原版给它消灭了。《太平花》这部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写作，但在这两度大改之下，也就可以看到“白云苍狗”，人事是变幻得太厉害了。

三十 抗日的方向

“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也自己想到，我应该作些

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唯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不过中日之战虽起，汪精卫这般人的口号，是一面抗战，一面交涉。所以，尽管忿愤不平，谁也不敢公然反抗日本，政府就不许呀。我所心响的御侮文字，也就吞吞吐吐，出尽了可怜相。

那时我在北平，在两个月工夫内，写了一部《热血之花》，主题是国人和海寇的搏斗，当然，海寇就指着日本了。另外，我出了一个小册子，叫《弯弓集》，都是些鼓吹抗战的文字。这个，我没有打算赚钱，分在上海、北平出版。这谈不上什么表现，只是说我写作的意识，又转变了个方向。由于这个方向，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例如我写《水浒别传》，我就写到梁山招安以后，北宋沦亡上去，但我不讳言，这些表现，都是很微渺的，不会有什么作用可言。仅仅说，我还不是一个没灵魂的人罢了。想不到这个，也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们曾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提过抗议，后来，我也终于离开了北平。

三十一 《东北四连长》

当我在《新闻报》写了一年小说之后，《申报》方面，就有人约我写小说。而我首先以忙婉谢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国内两大报的长篇，都归我一人包办，那自然是盛举，但也应当考虑到文坛上的反应，这是我早有同感的。我为人向来不拆烂污，而一切事情的开始，总有个考虑，既然如此，我就更不要写了。不过这里又牵涉到了友谊问题。上海编副刊的，号称一“鹃”一“鹤”，

“鹤”是《新闻报》的严独鹤，“鹃”是《申报》的周瘦鹃。周先生是个极斯文的作家，交朋友也非常的诚恳。他和我同年，在上海相见之后，非常的说得来。那时《申报》的“自由谈”，改载新文艺，鲁迅先生常化名在上面写散文，非常的叫座。“自由谈”原来地盘，改名“春秋”，还是周先生编。他以友谊的关系，一定要我写个长篇。他说，章回体小说，要通俗，又要稍微雅一点，更要不脱离时代，这个拿手的人，他实在不好找，希望我帮忙。我虽然自知够不上那三个条件，而瘦鹃的友谊，必须顾到，终于我给他写了一篇《东北四连长》。

这书名，很显然，就是说东北御侮的故事了。我对军事，是个百分之二百的外行，怎能写起军中生活来呢？也是事有凑巧，我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他那时正在北平闲着，常到我家里来谈天。我除了在口头上和他问过许多军人生活而外，又叫他写一篇报告。我并答应给他相当的报酬。报酬他不要，报告却写了。我就以另一种方法，帮助了他的生活。在这情形下，有两三个月的合作，我于是知道了很多军中生活，就利用这些材料，写为抗日的文字。

我为什么写四个连长呢？我的意思，那时南京方面，正唱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实在不能找出一位大人物来作小说主角。还是写下级干部的好。这样，也就避了为人宣传之嫌。这长篇登报一年多，并没有什么大漏洞。而这四位连长，我是写他们有三位在长城线外成仁的。多少也给大人先生一点讽刺。后来我在上海遇到电影界的王次龙，他说这不失为硬性的作品，他要编写电影。但以时局的日见严重，这文字却拿不出来。

胜利后，这书已经写过十年了。上海出版商人抄写了报上的稿子，寄我审查，要我出版。我自己看了一看，我有些失笑。

因为经过八年的抗战，又经过世界二次大战，就根据我在书报上看的战事新闻而论，我当时描写的是太幼稚了。不过书中的个人故事，倒还可以利用。于是我把作战部分的描写，完全删掉，只着重故事的发展，结局我以人道主义去发作感慨。这不用说，对于整个宇宙里的战争，我是不赞同的。而这书归到日本人的侵略，逼出战事来，也不大违反原意，就是这样交了卷。书名也改了，利用了那仅传七字的一首诗，“杨柳青青莫上楼”，题曰《杨柳青青》。这书前年已出版，大概到现在是三版了。

三十二 《啼笑因缘》的尾巴

二十二年春，长城之战起。我因为早已解除了《世界日报》的聘约，在北平无事（我在北平后十年来，除了《世界日报》的职务外，只作了《朝报》半年的总编辑，无关写作，所以未提）。为了全家就食，把家眷送到故乡安庆，我到上海去另找生活出路。而避开烽火，自然也是举室南迁的原因之一。

我立刻觉得这是另一世界，这里不但没有火药味，因为在租界上，一切是欢天喜地，个个莫愁。有些吃饱了饭，闲聊天的朋友，还大骂不抵抗主义。在这种过糜烂生活唱高调的洋场里，文字生涯，依然是宽绰的道路。而我到了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业方面，包围我，要我写《啼笑因缘续集》。

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决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

终，将我那故事，整个的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去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的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我还是那句话，扭拗不过人情去，就以半月多的工夫，写了短短的一个续集。我把关寿峰父女，写成在关外作义勇军而殉难，写到沈凤喜疯颠得玉损香销，而以樊家树、何丽娜一个野祭来结束全篇。我知道这是累赘，但还不致于拖泥带水。当然，在和我表示好感的朋友都说我不该续的。

三十三 二次加油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安排了一个亭子间作书房，继续我一切没有写完的稿子，没有敢接受什么新契约。不过我于上海，倒有更多的认识。我以为上海几百万人，大多数是下面三部曲：想一切办法挣钱，享受，唱高调。因之，上海虽是可以找钱的地方，我却住不下去。二十二年夏季，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四弟牧野，他是个画师。他曾邀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办了个美术学校。我不断的帮助一点经费，我是该校董事之一。后来大家索性选我作校长。我虽能画几笔，幼稚的程度，是和小学生描红模高明无多。我虽担任了校长，我并不教画，只教几点钟国文。另外就是跑路筹款。柴米油盐的琐事，我也是不管的。不过学校对我有一个极优厚的报酬，就是划了一座院落作校长室。事实上是给我作写作室。这房子是前清名人裕禄的私邸，花木深深，美轮美奂，而我的校长室，又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把这屋子作书房，那是太好了。于是我就住在学校里，两三天才回家

一次。除了教书，什么意外的打扰都没有，我很能安心把小说写下去。

这一阶段，我给《新闻报》写完了《太平花》，跟着写第三个长篇，是《现代青年》，《旅行杂志》的《似水流年》也写完了，改写作《秘密谷》。这书是抽象的，我说大别山里，还有个处女峰，峰下有个秘密谷，里面的人，还是古代衣冠，因为他们和外面社会，隔绝一个时代了。借着这些人，可以象征一些夜郎自大的士大夫。后来那个国王出来到南京，拉洋车死了。因为他不会干别的。这写法不怎么成功，可是这个手法，我变着写《八十一梦》了。同时，我在上海临走以前，接了《晨报》的契约，给他们写一篇以女伶为背景的小说，叫《欢喜冤家》。这时还继续地写。

在我未去上海以前，我还给《世界日报》写了个长篇，叫《第二皇后》。去上海以后，就中断了，回到北平，我也没有继续。这时我住在北平，北平倒没有特约稿。因此，有些人误认我很闲，又来找我写东西。

有两位《新晨报》的朋友，在《太原日报》服务，一定要我写个长篇，磋商数日之久，情不可却，我写了一篇《过渡时代》。这是说社会上新旧分子的矛盾现象，信手拈来，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成绩，只听到朋友说，还有趣而已。因为《南京日报》也要稿子，我就多抄了一份，两地发表，算是多完了一份人情。

这时，我虽忙，却不象二十年那样忙。借了学校的好环境，多看一点书。每当教授们教画的时候，我站在一旁偷看，学习点写意的笔法。并直接向老画师许翔阶先生请教，跟他学山水。这算是二次加油时代吧。

三十四 西北行

自“九一八”以后，东北整个沦陷，国人鉴于国土日蹙，就有开发西北，以资补救的想法。西北自唐宋以来，日渐荒芜，于今是大片的成了不毛之地。想用西北的土地，来补救东北所失生产，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西北无水，无森林，无矿产，无交通，一切都谈不上。但开发西北这个呼吁，究竟是不错的，便是东北没有沦陷，也该去开发。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想到西北去看看，以求得一个认识。我这时除了写作，没有固定的职业，倒是落得趁机一行，于是我就赶写好了约一个足够用的稿件，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由北平到西北去。

我原来的计划，先到陕西，再到甘肃，由甘肃往新疆，回头经河套，由平绥路回平。预定的旅行日期是半年。我知道西北旅行，用不了多少钱，带了学校里一位工友，两个人共预备了一千五百元的川资。后来又打听得汇兑还十分方便，带多了钱，也不好，又减少了五百元。行程先是南下，坐平汉车到郑州。在郑州改坐陇海车到洛阳。本来由郑州可以直达潼关的，但这个历史名都，我总得看看。所以到洛阳游历了几天，才去潼关。当年，陇海路只通到潼关为止。在潼关住了几天，上了一趟华山，重回潼关，才坐汽车去西安。在西安住了将近半个月，然后坐汽车到兰州。在兰州的时候，我原是打算继续西行，因接到上海几封电报，劝我别去新疆。兰州朋友，也告诉我新疆的盛世才是不好惹的，去了不得回来，那可是个麻烦。而且由兰州到猩猩峡，猩猩峡到迪化^①，路途遥远，交通工具也有问题。这样，我只好

^①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在兰州徘徊着，最后，依然坐了便车回西安。

这一次旅行，虽然没有完全符合我的愿望，但是我拜访了我们祖先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在儿童时代所读的经书上，许多不可解的事，都给我解答了。我的游历，向来是不着重游山，玩水。因为山水是静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除了大灾难，很少有变迁。唐宋人看了那山水，作下一篇游记，可能现在去看，还是那样，你再写一遍，也不见得有什么新鲜。何况那里的山水名胜，也不断的有人记载。我的游历，是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我写出来，当然也是如此。这种见解，也许因为我是新闻记者的关系，新闻记者是不写静的，死的事物的。

在我去西北的时候，陕甘的军政当局，颇为注意，以为我去干什么？虽然有人说我是找小说材料来的。但很难引起人家的相信。因为很不容易遇到这种傻人而发这种傻劲。这我得感谢布衣主席邵力子。他原和我认识。在潼关，我托县长给我通了个长途电话，邵先生就答应用省政府的便车接我。到了西安，邵先生因坠马受伤，病榻边一度谈话，他非常的了解我。他对人说，张恨水是个书生。大概他暗示着部下，给我一点礼貌就够了。此外是尽量给我创作上的便利。而绥靖主任杨虎城也就这样办了。

在西安几天之后，各方面全明白我真是来找材料的，大批的碑帖，大部头的县志书，纷纷用专人送给我。还有那社会上的热心人士，跑到旅馆里和我长谈，把民间疾苦，向我和盘托出。其中有一位军官，愿意和我共坐一架战斗机去天水看看。坐战斗机这勇气我虽然还有，可是我考量我的身体，恐怕不行。只好婉谢。然而这证明一个人若为他的工作而努力，而没有其它企图的话，是很能引起人家的共鸣的。因此，我由西安去兰州，就得

着公路局的伟大帮助，和总工程师同坐一辆轿车而去。这轿车是宋子文留在西安的，其舒适自不待言。连我同行的那位工友，也沾着很大的光，坐了公路局的工程车。要不然，西北公路的初期交通，是有让人难于忍受的艰苦的。

三十五 西北回来

在陕甘一度旅行，自然是得着关于历史的教训不少。但我更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真有苦的呀。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的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增加将死者的痛苦）。由民国初几年起，陕甘人民坠入了浩劫的深渊。十九年的旱灾和西安一年的围城，发生了人间不可以拟议的惨像。我到陕西的时候，浩劫已过两年多，而一切遗痕都在。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我为了要描写西北那些惨状，曾用一种倒叙法，将十九年的灾情写出。将一个逃难的女孩子为骨干，数年之间，来回两次西北，书名是《燕归来》。这书发表于《新闻报》，后在上海出版，天津也有人盗印。敌伪时代，曾拍电影，听说被日本人禁止。《燕归来》之外，我又写了一部同类的小说，叫《小西天》。这是用名

剧《大饭店》的手法，以西安一个大旅店为背景，写着各阶层的人物。这书紧接着《东北四连长》发表于《申报》。

由西北回来，我自然是先回上海接洽稿件。但我有意找西北一个反照面，我也和阔人一样，立刻跑到庐山去避暑，在五千公尺的牯岭上，面对着那些夏屋渠渠的富贵山谷，我住了一个多月。不过这里材料虽多，我却没有勇气去写，写了谁和我出版呢？我只写了一篇轻松点的《如此江山》，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那是全以庐山风景为背景的。

对西北的印象，我毕生不能磨灭。每当人家嫌着粗茶淡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陇东关西一带，人民吃莜麦的事实。莜麦是一种雀麦磨的粉，乡人只用陶器盛着，在马粪上烤干了吃，终年如此。不但没有小菜佐饭，连油盐都少见的。所以那里的东方人，盛传着老百姓过年吃一顿白面素饺子，活撑死人的故事。因此，我每每想着，我们生长在富庶之区，对生活实在该满足。

三十六 参加《立报》

二十三年秋季，我又回到了北平，还是住在美术学校。我继续写着上海几家报纸的小说。《晨报》的《欢喜冤家》完了，我换了个长篇《北雁南飞》。这书是满清末年，一段不自由的婚姻。因为我觉得写当前的社会小说太多了。故意写个有历史性的。这一年的小说不太多，经常是四、五篇在手边写。

约莫是一年工夫，北国的风云，时紧时松，我也有点感觉，北平终非乐土，又动了全家南迁之意。在二十四年秋天，成舍我君邀着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小报《立报》，约我南下，担任一个副刊编辑。他知道我不能久住上海，约以三个月为期，我也就答应

了。

《立报》由事务人员到编采人员，可以说人才济济，那由于加入这公司的股东，都是老新闻记者的缘故，他们拉拢人才，自然是比较容易。我于十月间到上海，替《立报》编一个副刊，叫《花果山》，我并自写了一篇小说，叫《艺术之宫》。这个题材，是以模特为背景的。写一个守旧的女子，为家穷而去学校当模特。完全是以一个悲剧姿态出现的。自信与他人写模特不同。这书写完之后，好几个出版商要出版，竟因搜罗报上稿件不易，未能实现。

我在上海约期即满，正打算回来。一夜之间，接到北平去的两个急电，叮嘱缓归。那时，平津一带，迭次出事，冀东已出现伪政府。我知道事情不妙，就中止北行。过了几天，得着家信，说是日本人捉拿北平文化界人士，有张黑名单，区区竟也忝列榜尾。我根本已不留恋北平了，自然就不冒那险而北上。

三十七 办《南京人报》

我虽然讨厌上海，我的生活，却靠了在上海发表文字，要离开上海，而又不能离得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于是我临时选择了个中止地点，南京。南京除了到上海很近，到故乡也很近，而尤其可以住下的，是朋友很多。

我在南京住下两三个月，除了写稿子，只是和朋友谈天。而我对于南京，又有个不好的印象。在很早以前，欧美人士，就预算出来了，一九三六年，将是世界大战年。当时德意日军事力量的疯狂发展，正吻合了这些预言。以南京首都^①所在，人材荟萃，对于这个说法，应该有所感觉。可是南京士大夫阶级，很能

^①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

保持“六朝金粉”的作风，看他们的憩嬉无事，不亚于上海，我又想走，但我向那里去呢？国内找不着桃花源，而我又需要生活，正徘徊踌躇着，老友张友鸾君鼓励我在南京办一张小型报。不过他比我还穷，钱是拿不出来的，只能出力。这时，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原来的打算，是想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乡下，钱是够了的，就因为我对南京已不感觉兴趣，这计划没有实现。这时据友鸾的计划，在南京出一张小型报，一切印刷条件在内，开办费只需三千多元，我尽可拿得出来。我原来还是有点考虑，经友鸾多方的敦促，我见猎心喜就答应了。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读者在报上或尚可看到《南京人报》消息，就是那家报，不过胜利^①以后，我为了和陈铭德先生北上办《新民报》北平版，我以最大的牺牲，报答八年抗战的友谊，把《南京人报》让给友鸾去办了。现在的《南京人报》与我无关，附带一笔。

办《南京人报》，犹如我写《啼笑因缘》一样，震撼了一部分人士。这报在不足一百万人口的南京市，出版第一日，就销到一万五千份。我当然卖老命。张友鸾君和全部同人（我们那个报，叫伙计报，根本没有老板），没有一个人不使出了吃乳的力气。我那时的思想，虽还达不到“新闻从业员有其报的程度”，可是全社的人，多少分一点钱，我却是白尽义务，依然靠卖稿为生。我并不是那样见利不取的人，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不过“予”的数目很可笑罢

^① 指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了。除了印刷部是照其他报社一律待遇，总编辑才拿四十元一月的薪水，副社长支薪一百元，还编一个副刊，又写一篇小说。普通编采人员，月支二十元。请问，我怎忍心要钱？但这点与同人共甘苦的精神，把《南京人报》办得如火如荼，让许多人红眼。我并非卖瓜的说瓜甜，我这点经验，觉得还值得介绍出来。可见穷办报也未尝办不好。

我在《南京人报》，除了管理社务，自编一个副刊，叫《南华经》。自写两篇小说。一篇叫《鼓角声中》，写着受日本人威胁的北平。一部就是近乎武侠小说的《中原豪侠传》。我写这篇武侠小说，不讳言是生意经。但我对武侠小说的见解，已如前文，所以这篇《中原豪侠传》，更写得近乎事实。而是以辛亥革命前夕，河南王天纵的故事，作影子。并请刘亢先生每日插一幅图。出乎意料，这篇小说比《鼓角声中》还叫座，我倒是聊可自慰的。除了这些，我每日还自写许多散文，和一篇故事新闻，所以每日直到夜深三时才回家。我这种苦干，博得许多朋友帮忙。例如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兄，无条件地给我写社论。一度盛世强兄在北平和我打长途电话，也是义务。而张萍庐兄编了一年的《戏剧》，只拿了一个多月稿费，令我至今不忘。

三十八 被腰斩的一篇

我办报既然还靠稿费为生，写作自然是要加多。我统计一下，这时是《新闻报》写《燕归来》结束，改写《夜深沉》；《申报》《小西天》完了，改写《换巢鸾凤》；《晶报》有一篇《锦片前程》，登了两三年了，因为登的太少，还在写。《立报》继续着《艺术之宫》，无锡的《锡报》，快将《天上人间》的旧稿登完，也开始补写。南京除了

《南京人报》两篇，还有《中央日报》的一篇。而《旅行杂志》一月一次的长稿，也短不了，这时我写着《平沪通车》。办报而外，这样多的长篇，我在四十之年，又发挥牛马精神，而作文字机器了。

提到在《中央日报》写稿，这倒有一段小插曲，开始，我是无意在《中央日报》写稿的，因为我不会党八股。那时总编辑周帮式，是《世界日报》老同事，再三的要我写，我就只好答应下一篇。为了适合人家的环境，我写的是太平天国逸事《天明寨》。那几年，我特别的喜欢看太平天国文献，所以有此一举。这书里说了许多天国故事，还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书完了，《中央日报》又要我写，我就写了一篇义勇军的故事，以北平为背景，叫《风雪之夜》。大概也写了四五个月了，忽然周君给我来封信，说对我的稿子，“奉命停刊”。不客气地说：腰斩了。当时抗日有罪，是不算一回事的。

不过，这事也未完全过去。抗战期间，《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的时候，又有人拉我写稿，而且不止一年，不止一次。我当然没有求腰斩的洋瘾，只好微笑婉谢。

三十九 在南京苦撑的一页

《南京人报》办了一年多，终于大难来临，中日战事起了。八月十五日，日本飞机，空袭南京，立刻将南京带进了严重的圈子里去。一切的稿子都不能写了，但报却是要办。这个报，开始就是小本经营，自给自足的。这时，南京人跑空了，没有人看报，更也没有广告，报社的开支，却必须照常。我身为社长，既是家无积蓄，又没有收入，那怎么办呢？让我先感谢印刷部全体工友，他们谅解我，只要几个维持费，工薪自行免了。甚至维持费发不

出来也干。他们为了抗战而坚守岗位，不愿这“伙计报”先垮，而为“老板报”所窃笑。这实在难得之至！编采同人更不用说，除了几个胆小的逃去芜湖（后来又回来了），全体十之八、九同人，拍拍颈脖子，“玩儿命，也把《南京人报》苦撑到底”。张恨水有这样的人缘，那还有什么话说，我就咬着牙齿，把《南京人报》办下去。这时，全部家眷，疏散到离城十几里的上新河去住。我在报社，由下午办理事务和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红日东升，方才下乡。下乡之后，什么也不干，就是放倒头，补足这一夜睡眠。醒来之后，吃点东西，又赶快进城。这“进城”两个字，在当日并非简单的事，每每行到半路途中，警报就来了。南京城郊，根本没有什么防空的设备，随便在树荫下，田坎下把身子一藏，就算是躲了警报了。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弹，昂起头来，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种震耳的交响曲，自然也就不怎么好听。但身入其境的，是无法计较危险的，因为天天的情形都是如此，除非不进城，要进城就无法逃避这种危险。炸弹扔过，警报解除了，立刻就得飞快的奔到报社。其实这种危险，倒没什么痛苦，至多是一死而已。而到了报社，立刻把脑子分作两下来运用，一方面是怎样处理今晚上的稿件，一方面是明天社中的开支，计划从哪里找钱去？这个时候，不用说向朋友借钱有着莫大的困难，就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支取几十元。二十四小时，无时不在紧张恐慌中挣扎。这样的生活，是不容日久支撑维持的，不到一个月，我就病了。病得很重，主要的病症，是恶性疟疾，此外是胃病，关节炎。报社里的事，只好交给别人，我就在上新河卧病。虽然卧病，问题也不简单，自己的家眷和南下逃难的亲属，一家之中，集合到将近三十口人。不说生活负担，不是个病人所能忍受，而每当敌机来空袭的时

候，共有十七、八个孩子，这就让人感到徬徨无计。因之这一时期中，没有写作，也没有心去看书，几乎和三十年来的日常生活完全绝缘了。因为病，我是十一月初首先离开南京，到芜湖医院治病。病将好，南京也快陷落了。我和家眷在安庆会合，再避居故乡潜山县城。《南京人报》于十二月初，南京陷落的前四、五日停刊。由我四弟负责收束。结束了我办报的一页。

四十 入川第一篇小说

我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底，离开了故乡潜山，由旱道到武昌，乘轮到汉口。因为《南京人报》在结束时期，借了朋友两千多元。并无借据。这位朋友，是径向四川去了。为保持信用，我必须还这笔钱。四弟同意我这办法，把一部分机器、铅字，用木船载着，由南京溯江西上，最后的目的，也是重庆。这意思是或者在重庆复刊，或者卖了机器还债。我是债务人，自然得赶向重庆。后来就走的是第二条路。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我到了重庆，去《新民报》在渝复刊之期，只有五日。同事张友鸾君，原早在《新民报》当过总编辑，这时是主笔，他建议陈铭德君，约我加入《新民报》。我根本无事可做，就答应了。但我和《新民报》合作，不自这时起，在前四五年，我写了以电影题材为故事的小说《旧时京华》，在《新民报》发表过，但未登完。二十五年，我也写了一篇《屠沽列传》，在《新民报》发表，这书是和《武汉日报》，成都另一家《新民报》，三家合载的，也因故未能登完。这该算是我们三度合作了。

那时，《新民报》是由一张对开报，改为小型四开的。倒有两个副刊。一个副刊叫《最后关头》，由我编，我并由社方的要求，

写一篇小说，叫《疯狂》。为什么叫《疯狂》呢？在南京，在武汉，我看到有许多爱国有心，请缨无路的人，十分的感慨，觉得爱国也有包办之可能了。在汉口，我四弟叫我不必西上，机器丢了罢，回大别山打游击去。他说，在武汉有一部分同乡青年，有此主张，希望我年长一点，出来协助。我不但赞助，且非常兴奋，就写了个呈文给当时的第六部，请认可我们去这样办。我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是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故乡人发生误会，然而被拒绝了。虽然我四弟终于打了一年的游击，那是另外找的一条路线。我对这事，非常的愤慨，觉得有爱国而发狂的存在，所以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可是，重庆为战时首都^①，写文章不能那样随便，《疯狂》这篇小说，越写越胆小，到写完的时候，几乎变了质。书写完，发现完全违背了我的原意，连报上的陈稿，我也不愿剪集，更不用说是出版了。这是我抗战军兴后，第一次写作的失败。

四十一 《游 击 队》

在《疯狂》发表的期间，老友张慧剑兄，到了重庆。原还没有加入《新民报》，而是替《时事新报》编一版副刊。他非要我写一篇小说不可，我抽空写了个中篇，叫《冲锋》，是写日本人侵犯天津时的一段人民自卫故事。后来慧剑建议，可改名《天津卫》，以双关的意义来笼罩一切。这意思当然很好。不过这书在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时候，我得着许多游击队的消息，又鉴于大后方豪门的生活令人愤慨。于是我在书前后各加上了一段，将

^①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

书名改为《巷战之夜》。我的小说单行本，恐怕要以这书和《银汉双星》是字数最少的了。

提到游击队，我曾另外写过几篇，计有发表于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山血》（此篇未写完）。《立煌皖报》的《前线安徽，安徽的前线》，《申报》汉口版的《游击队》，这两篇也都没有写完。在《立煌皖报》发表的那篇小说，我完全以安徽人的关系，大半义务的写稿，并没有含着任何作用。可是安徽的统治者，认为这篇小说，夸张了游击队，那是和他们的政治作风不对的，也宣告了腰斩。写游击队有什么不对呢？我决不因未能写完而灰心。相反的，我更积极地搜罗材料。重庆也很有几位朋友，愿供给我这路材料。但究因这路材料太片断、太零碎，不能集成成书。这话现在可以公开，《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就曾允许我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我很惭愧，我竟无以报命而写成一部书。其实这里面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太多了。希望将来有人写一个宝贵的长篇。

四十二 抗战小说

我在重庆从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这是我生活最艰苦的一段，自己由重庆扛着平价米，带到十八公里的南温泉去度命。所以我还不能不努力写稿。那时，上海虽然沦为孤岛，《新闻报》还不曾落于汉奸之手，重庆到上海的航空信，可以由香港转。《新闻报》继续要我写稿，我就写完了《夜深沉》，又继续着写了一篇《秦淮世家》，这是以歌女为背景，而暗射着与汉奸厮拼的。最后，我就写《水浒新传》了。

《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那完全吻合上海人“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以快意”的口味。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

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的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的_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象。书写到四十多回，太平洋战起，上海已整个沦陷，我才停止寄稿。三十二年，我受书商之托，加上二十多回，完成了这部书。共六十多万字。抗战期间，这是我写的最长的一部了。

二十九年，我另写了一篇《大江东去》发表于香港。中间有日本屠杀南京人民的一段描写。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出版，这倒是销数较多的一部书。在大后方，仅次于《八十一梦》。这书在美国听说有节译本，发表在报上。报，我未见之，是朋友告诉我的。

四十三 《八十一梦》

《八十一梦》这部书，在大后方是销路最多的一部，延安也翻过版（《水浒新传》好象也翻过）。这书我不敢说是什么好作品，但在痛快两字上，当时是大家承认的。

在《疯狂》写得我无法完篇的时候，我觉得用平常的手法写小说，而又要替人民呼吁，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之，我使出了中国文人的老套，“寓言十九托之于梦”。这梦，也没有八十一个，我只写了十几个梦而已。何以只写十几个呢？我在原书楔子里交代过，说是原稿泼了油，被耗子吃掉了。既是梦，就不嫌荒唐，我就放开手来，将神仙鬼物，一齐写在书里。书中的主人翁，就

是我。我做一个梦，写一个梦，各梦自成一段落，互不相涉，免了做社会小说那种硬性熔化许多故事于一炉的办法。这很偷巧，而看的人也很干脆的得一个印象。大概书里的《天堂之游》、《我是孙悟空》几篇，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书里我写着一个豪门，有一条路可通半空，给它添上个横额，《孔道通天》。朋友都说，这太明显了。又孙悟空和一位通天圣母斗法而失败，朋友也说这可能是个“漏子”。某君为此，接我到一個很好的居处，酒肉招待，劝了我一宿。最后，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①一带，去休息两年？我笑着也就只好答应“算了”两个字。于是《八十一梦》，写了一篇《回到了南京》，就此结束。

事过境迁，《八十一梦》，无可足称。倒是我写的那种手法，自信是另创一格。《新华日报》曾有几篇批评，谈到了小说的形式问题。

四十四 生活材料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文艺，也免不了一套抗战八股。这个问题，曾引起几次论战。当然，在抗战期间，一切是要求打败日本，文艺不应当离开抗战，这是对的。不过老是那一个公式，就很难引起人民的共鸣。文艺不一定要喊着打败日本，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当年大后方时常喊着“讳疾忌医”的这句成语，因此有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就不注重公式的抗战文艺了。

我向来看得我自己很渺小，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着能发生

^① 当时在息烽设有国民党特务监狱。

多大的作用。严格的说，不但是我，一切从事文艺的人，应该有这个感想。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压根就没有重视过文艺，至多，录用几个御用的政论家，就算没有忽视文艺，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这个作风没有改。所以这二十多年来，文艺家为生活所苦，为思想束缚所苦，没有法子产生伟大的作品。象我这样车载斗量的文人，自是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我也就变了那公式的文章写法，在此期间，除了和《旅行杂志》，写了一篇无关痛痒的《蜀道难》而外，我另辟了一条路线去找材料。计在《新民报》发表的，有一篇极长的《牛马走》，和一篇二十多万字的《第二条路》（后在上海出版，改名《傲霜花》）。还有一篇二十多万字的《偶像》。接着《蜀道难》，给《旅行杂志》写了《负贩列传》（后来改名为《丹凤街》）。这里所写的人物，都是趋重于生活问题的，尤其《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

抗战是全中国人谋求生存，但求每日的日子怎样度过，这又是前后方的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有这么一个意识，所以我的小说是靠这边写。可是，当年在大后方的报纸杂志受检查，而书籍也是受检查的。我既靠写作为生，我决不能写好了东西而“登不出来”（当年《新华日报》被检的文字，以此四字作声明）。所以我虽然要写人民生活，只是在写作技术上兜圈子，并不能做什么有力的表现。

在三五年（一九四六年）间，我例外的写了一篇纯军事的小说，那就是《虎贲万岁》。我说过，对军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怎么写军事小说呢？在《虎贲》序文上，我交待得很清楚。乃是在常德作战的残余官长，有两个参谋，他要求我写的。他们无条件的借给了许多作战文件我看。同时，这两个参谋，并不断地到我

茅居里来现身说法。这个要求，几乎有一年之久，我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就写了这篇小说，而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完卷。至于他们何以要这样做？他们说是对那战死的一师人，聊尽后死者的责任。我相信，这不是假话，因为他们并无所得，也无所求。我写战地里的一个伙夫，都是真姓名，而这两位参谋的姓名，为了避嫌，却不在其列，这是可以证明他们的态度的。

四十五 茅屋风光

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材料，是眼见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而不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生活不会明显地反映到文字里去。但文字终究是生活的反映，人不经过某种生活，是不会写出某种文字的。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生活上的一种艰苦的锻炼，就不会知道人家吃苦是什么滋味，自己也就体谅不到吃苦。天下尽有在咖啡座上可以谈农人辛苦的人，但是不论怎样的谈下去，决不能丝毫搔着痒处。我虽然没有历尽人世的艰辛，可是社会各阶层，我都有过亲切的接触，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在战前很不容易得着的茅屋生活，我就过了七年。自信，这种环境，比我读了许多书的教训还要深切有益。这对于写作，不但有莫大的帮助，就是对于为人，也有了莫大的指示。这一点，倒不宜抛弃的。我写的是写作生涯回忆，既涉及写作，而又是生涯的事，我也不妨写一点。

因抗战而入川的人，象潮水一般的涌到了四川，涌到了重庆，重庆的房子立刻就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加之二十八年夏季的日机大轰炸，将重庆的房子，炸去了十分之五、六，让在重庆住鸽子笼的人，都纷纷地抢下了乡。乡下也是没有房子的，于是下

乡的人，就以极少的价钱，建筑起国难房子来居住。这种国难房子，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砌，当了屋子的墙，将活木架着梁柱，把箴子扎了，在山上割些野草，盖着屋顶。七歪八倒，在野田里撑立起来，这就是避难之家了。这种房屋，重庆人叫着捆绑房子，讲的是全用竹箴捆扎，全屋不见一根铁钉。

我也有这样一所茅屋，但这茅屋不是我盖的。也不是我租的，是朋友送的。原来我住在一幢瓦房子里，有两间房，相当的干净，房东要发国难财，撵我们出去，要卖那房子。这房子后面有十间茅屋，除了出卖了四间，将六间租给了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房东是我的朋友，他让我搬了去，议定自修自住，不取房租。我也无须六间屋子之多，住了三间，又让了三间给一位穷教授。于是安居了好多年。除了我故乡那间老书房，这三间茅屋对我的写作生涯，是关系特深的。

在我的小品文集《山窗小品》里，对这茅屋是描写得很清楚的。简单言之，窗子外是走廊，走廊下是道干涸的山溪，上面架有木桥，直通走廊，木桥那头，是丛竹子。竹子后面，是赶集的石板路，石板路后面是大山。山上原来有树。而国民党的军队，来回砍一回，砍来将柴卖给老百姓（我说这是一幕喜剧。我们窗子外的树，我们不敢动。人家砍了，还卖给我们拿了钱去。我们真是白痴呀）。这样山就光了。不过，下雨，溪里有洪水；出月，山上有虫声；下雾，眼前现出变幻的风景。这里还是很有趣的。当然，这里却不会引起高人隐士之风。第一，在这个溪两旁，全是受难的公教人员，穷的教员，穷到自己浇粪种菜。大家见面，成日的谈着活不下去。第二，村子里也有极少数的投机商人，对我们的生活，很是一种刺激。第三，隔了面前这座山，就是孔公馆。孔公馆建筑在一座高山上，绿树葱茏，石磴上拔，环曲千级，

四层立体式的洋楼，藏在一个树林的峰尖下。不说里面的布置，单是穿山的这一座防空洞，里面有无线电，有沙发，有电话，也就可知其阔绰了。这不过无数孔公馆之一，孔院长、孔夫人、孔二小姐，根本不来，只有几十个副官，在这里落寨为王，打家劫舍。这不但文艺人看了心里不平，所有的老百姓，都侧目而视。这一点，往往是引起了我写作的愤慨情绪的。我茅屋里夹壁上，自书了一副对联：

闭户自停千里足
隔山人起半闲堂

四十六 《上下古今谈》

我生平所写的散文，虽没有小说多。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朋友替我估计，我编过副刊和新闻二十年，平均每日写五百字的散文，这累积数也是可观的。但我的散文，始终用“恨水”的笔名，而为社会所注意的，要算是在《新民报》的《上下古今谈》。当我写第一篇《上下古今谈》的时候，我曾说过，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我都愿意说一说。其实，这里所谓大小也者，我全是逃避现实的说法。在重庆新闻检查的时候，稍微有正确性的文字，除了“登不出来”，而写作的本人，安全是可虑的。我实在没有那以卵碰石的勇气，不过我谈了谈宇宙与苍蝇，这就无所谓。我利用了我生平读历史的所得，利用了我一点普通科学常识，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我们就可以谈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夫人之流，我们可以谈杨贵妃；说到大贪污，我们可以说和坤；提到了重庆政治的污浊，我们可以说雾；提到

狗坐飞机，我们可以说淮南王鸡犬升天。这样谈法，读者可以作个会心的微笑。但我并没有触犯到当前的人物。

当然，检查人物，他是看得出来的，有时也被扣除了。但很能因文字对表面上的“言之有物”，他们没有理由扣除。当政协初开的时候，我曾一时灵机触动，将满清隆裕的退位诏书，删去不相干的段落，转录一道，作了《上下古今谈》。我并不知道，最好不要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文前只有很少的几句介绍话。这篇文字登出来了，在重庆竟是一个雷。有些作会心微笑的朋友，还转录到别的刊物上去，虽许多朋友们为我捏一把汗。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后来很多人劝我出书，我说这虽是谈古事，实在是有时间性的，出书没多大意思，所以不曾出版。

《上下古今谈》，写了好几年，大概有一千多条，有百万字上下。除了极少数几十条是用文言写的而外，百分之九十几，全是白话。不过都象隆裕退位诏书那样引用恰到好处，也并不多见。

四十七 散 文

为了说到《上下古今谈》，可以顺便谈谈散文。远在北平《益世报》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担任过每日一篇的散文。不过《益世报》有宗教的关系，散文不好写。那个时候的散文全是文言，只是在语助词上兜圈子，除了运用子史格言，很难发挥什么意见。这样的散文，大概写了二三百条，完全是一个作风，那时，给《益世报》写社论的颜旨微君（此君早已去世），就很主张我继续写。但我都以词穷而婉谢了。至于我历年编写副刊，那都是每日为

补白而作，虽写的很多，却不成格式，差什么，写什么，差多少，写多少，事后只有送进字纸篓。可是在大后方，写了两个散文集。一个是《山窗小品》，一个是《水浒人物论赞》。《山窗小品》，就是我在茅屋写的，写的全是眼前事物。《水浒人物论赞》，那是我搜集当年为《世界晚报》、《南京人报》写的稿子，再补上若干篇成的书。关于前者，我走的是冲淡的路径，但意识方面，却不随着明清小品。关于后者，我对水浒人物，用我的意见，对那些人做一个新估价。不过这两部散文，全是文言的，和《上下古今谈》的作风，完全两样。

我本也无意出书，因为在重庆的出版家，要求这样办，我就当古董卖了。

此外，我和国内刊物写的散文，三十年来，也不会太少。三十岁以前的作品，我自己都淡忘了。三十五岁以后，对散文我有两个主张，一是言之有物，也就是意识是正确的（自己看来如此），二是取径冲淡。小品文本来可分两条路径，一条是辛辣的，一条是冲淡的，正如词一样，一条路是豪放的，一条路是婉约的。对这两条路，并不能加以轩轻，只是看作者自己的喜好。有人说辛辣的好写，冲淡的难写，那也不尽然。辛辣的写不好，是一团茅草火，说完就完。冲淡的写不好，是一盆冷水，教人尝不出滋味。

四十八 斗米千字运动

再说到抗战时候的写作生活。所有在大后方的文艺人，没有一个能例外，都是穷得买不起鞋袜的。有些人教书，有些人当不被重视的公务员，有些人干脆打流浪。我还好，兼作新闻记

者，多少有些固定的收入。吃的是平价米，那是征买来的粮食（提到此，让人永远不能忘了四川人），分配各团体机关，再以极廉的价钱，配给薪水阶级人物，所谓平价是也。其实，谈到平价，等于白给。因此，米是古人所谓“脱粟”，仅仅是去了糠。砂子稗子谷子，总不下十分之一，我吃饭为挑去这些东西，时常戴起老花眼镜来，其苦是可知的。穿呢，由入川起，三个年头没缝一件小褂子。住，就是那茅屋了。行，这是比吃平价米还要头痛的事。重庆市是山城，无处不爬坡。马路也是在高低不平的山梁上建筑起来的。文艺人没有人能坐得起车轿，而且在重庆，也不忍心去坐车轿。石达开说的话，“万众梯山似病猿”，可以形容这一个轮廓。人力车夫拉上坡，头就和车把靠了地。轿夫上坡，气喘如牛，老远就可以听见。这样，只有挤公共汽车。城里的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买不着那张汽车票。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还要过一道长江。十次至少五次我是步行。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并没有谁发出怨言。可是当我们到疏建区，看到阔人新盖的洋房，在马路上看到风驰电掣的阔人汽车，看到酒食馆子里，座上客常满，就会让人发生疑问：一样在“抗战司令台”畔，为什么这些人就不应该苦？这样，文艺人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呼吁出改善生活来。

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文字在大后方，开始有点出路了。除了报纸收买稿子，也有些刊物出现。写文章的人，所谓改善待遇，当然以提高稿费为唯一的目标。于是由在桂林的文艺人发出了呼吁，要千字斗米的稿费。若在战前，江南的米，不过是十元以下一担。小都市里，四五元就可买到一担米了。一斗米的价值，不上一元钱，这种要求，可说是极低。可是大后方的粮价，始终是涨得太凶的，在我们要求千字斗米的时候，重庆的米，已

经超过了一百元一斗。不过川斗和普通市斗不同，它是三十二、三斤一斗，一斗等于两市斗强。折合下来，一市斗米，也需六、七十元。稿费怎么样呢？最高的稿费，没有超过十元。一下子要把稿费涨上去六、七倍，这是不可能的。我还记得，在抗战胜利接近的前夕，重庆最好的纸烟华福牌，是每盒一千元，而打破纪录的特等稿费，也是每千字千元。那就是说写一千字，只好买盒纸烟吸吸而已，而这还是特等的，稀有的。自此以下，那就不必提了。因此，千字斗米运动，只是一句口号，决不曾实现，而文人也就为米焦碎了心。

四川很少麦粮，除了米，就是包谷（玉蜀黍）红苕（红薯），及少数的高粱。而这些杂粮，只有乡下有，市上不大多见。所以当时的文人，都是为米而奔波。若是一个光杆文人，那还无所谓，在重庆还不难每日混到两顿饭。若是有家眷的文人，这就难了。我们在长途汽车边，在轮船码头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破烂西服或中山服的人，身边带着一个米袋子，那就是公教人员带平价米回家。自然，这包括文人在内。这情形，谁出斗米买一千字呀？

米价越来越贵，千字斗米运动，终于成为泡影。那时，我也就死了那条卖文的心，除了和《新民报》写着固定的文字而外，把写稿子的工夫余下来，看看架上残余的几套破书，或者念“无师自通”的英文，或者画“无师自通”的画。再有剩余的时间，就是和邻居谈天了。抗战八年中，平均每天不能写到三千字，可说是比较工作轻松的时期。假如那时能办到千字斗米，或许我可以多写出几部小说来。

四十九 夜生活

过了黄昏摸黑坐，无灯无烛把窗开，等她明月上山来。

这是二十九年，我填的几阕《浣溪沙》的半阕，说的是无油点灯。当然有人说，何致于穷得买不起菜油点灯呢？那也所费有限啦。这是有原因的。南温泉镇市上，有时是缺油的，非点鱼烛不可（北平叫洋烛）。一枝鱼烛，等于一斤多菜油的钱，这算盘不能不打。煤油又是珍品，也没有煤油灯（到胜利前夕，有煤油灯了）。尤其是冬天，不要说是月亮，重庆为雾所弥漫，整月看不到太阳，那明亮的月光，有时临到山窗，那是让人苦闷的情绪为之一振的。不过天下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在太平洋战争未发动以前，日本飞机，大批停在汉口，有空就会来袭重庆。月夜，是他们肆虐的好机会。因之有了月亮，又有躲警报的恐怖，我们总是在这矛盾的情绪下过着月夜。

若是没有月亮之夜呢（多数的时间是这样的），我们就在屋子里呆着。三间屋，照例是两盏菜油灯。夏天，窗子开了，蚊虫，小蛾子，以及一切不知名的虫豸，象雨点向灯上乱扑，两条光腿，若不是坐在雾气腾腾的蚊烟下，就得拿着扇子手不停挥。冬天，四川是不需御寒的炉火的，破袜子单鞋，坐久了也冷。春秋良夜，可以对灯小坐了，而油碟子里两三根灯草所放出的光亮，照着屋子里黄澄澄的，人影也模糊着，看书实在是有害目力，写稿是更无此心情了。所以在四川八年的夜间，除了进城，住在报社里，有电灯还可以做点事。若在乡下，夏天是乘凉而早睡，冬天是煨被窝而早睡。写文章的人，多半喜欢过夜生活，在重庆乡下的文人，可以把这习惯扭转来了。

五十 意外的救星

我的时间是这样的支配着，写的不多，而又无法多写，这生活是怎样地度下去呢？第一，报社里分的平价米，勉强够吃，第二，屋子不要钱（但是怕修理），第三，根本不作衣服，所欠的，也就是小菜和零用钱而已。在太平洋战争未发动以前，遥远的靠着上海转来的一点稿费，还在学校代过两年的钟点课，有时将报社的薪水前拉后扯，有时托朋友垫借几文，就这样穷对付着两三年。好在肉体上的艰苦，那是看在其次的事。我不幸住在这南温泉，乃是二陈的陈家寨所在，周围几十里，都是他们的教化圈子，精神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日久也安之若素了，自然更不计较衣食的困苦。

天下事，也有飞来的福分。正在太平洋战争起，香港新加坡都为日本魔爪席卷而去以后，我竟有些意外的收入。那就是在上海所出版的我的写作，崭新的封面，由香港兜个圈子，到了重庆。这些书，有的是我已经卖了版权的，有的是版权没有分明的，有的是版权还保留着的。我本人现在重庆，这大批的心血结晶品在街头出卖，我不能熟视无睹。出版家也非常的明白，就自动地来找我，告诉我他们是由香港转进的。过去，他们对发表的报社，已纳过版税。现在到了重庆，不管我版权谁属，凡是在重庆出卖的书，都打算翻印，也都给我百分之二十（新著），或百分之三十六（旧著）的版税。我当然也不过问过去，就和出版家订了新约。由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在后方出版和翻版的（世界书局翻版的不在内，因为那是我抽不到版税的），共有二十几种之多。每月所得的版税，可能超过我薪水十倍。于是我有钱做几件衣

服穿了，也有钱买肉给小孩子吃了，而且还有些剩余。直到胜利回家，我都利用着这点版税作川资。

五十一 土 纸 书

我在后方出的书，有一个特别的标志，那就是纸张是极恶劣的。因为在四川被日寇封锁之下，外国报纸是不能进去。在四川所有的任何刊物，全是用土纸印刷。这类土纸，是用手工制造出来的，质料比江南所谓表信纸还要坏些，比北平的所谓豆纸，也高明无多。有个时期，北平有许多刊物，用片艳纸印刷，大家就都觉得不舒服。其实片艳纸还有一面是光滑的，而四川的土纸，两面都粗糙黄黑，不但印字不清楚，而且印料太薄，先印的一面往往是“力透纸背”。平常的一份报纸，传观几个人，向口袋里一揣，再拿出来，那报纸就成了一团糟了。印书的纸，虽然尽量挑那些好的，可是印出书来，不清楚和“力透纸背”的事，依然在所难免。所以在后方小说得推销出来，那实在也足以证明精神食粮的缺乏，而有饥不择食之嫌了。一个在车站上等时间的朋友，他拿着一张报，可以看三、四遍的，甚至报上的广告，他也有可能一字不漏的看下去。我们可以知道，不是那张报编得连广告都精彩非凡，而是那个等时间的人，需要精神食粮，以度过他那个枯燥无味的光阴。所以我想，我一、二十种著作，在后方以土纸印刷，都可以出几版，大后方的人需要书籍，是很可证明的。

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除了极少数的作家，一篇之出，有他的用意，此外大多数的人，决不能打肿了脸装胖子，而能说他的小说，是能负得起文艺所给予的使命的。我承认那种土纸印的小说，尽管看得让人大伤目力，而读者还不过是消

遣消遣。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是否愿意以供人消遣为已足？是否看到看小说消遣还是普遍的现象，而不以印刷恶劣失掉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

这些土纸书，在胜利以后，也有人带到上海和北平来，大家看了，都摇头不止，不相信这种书可以卖钱。我这里就得附带一笔，有几部书，印刷也不坏，一来是带了上海的纸型，入川翻版，二来纸张也是好些的。

五十二 榨出来的油

现在我可以记一笔账，在抗战以后，在大后方完成和未完成的小说，是以下这些。《疯狂》约五、六十万字。《八十一梦》，约十七、八万字。《牛马走》，约百万字。《第二条路》，约三十万字。《偶像》，约二十万字。以上发表于《新民报》渝蓉两版。《巷战之夜》，发表于重庆《时事新报》。《夜深沉》、《秦淮世家》，各约三十万字。《水浒新传》，约六十万字。以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红花港》，约二十万字，《潜山血》（未完），发表于香港《立报》。《大江东去》，约二十万字，发表于香港《国民日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申报》（未完）。《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安徽皖报（未完）。《雁来红》，发表于《昆明晚报》（未完）。《虎贲万岁》，约四十万字，未在报上发表，由上海百新书店出书。《蜀道难》，约六万字，《负贩列传》（《丹凤街》）约二十万字，发表于《旅行杂志》。补足一部书，《中原豪侠传》，约三十万字。改掉一部书，《太平花》，约三十余万字。补足一集散文，《水浒人物论赞》，约五万字。写成一集散文，《山窗小品》，约六万字。此外，

各种散文，八年来，约写一百四、五十万字。

八年的年月，不算短暂，平均每日能写三千字的话，就当有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根据上面那些账，大概相去也不会太远。在生活安定的日子，文人可以去安心写作，这实在不算多。可是回想到那八年所度过的生活，就没有能写出这些文字的理由。当然，诗以穷而后工，这话还不能完全否定。但我作的不是成行的诗，而是连篇累牍的小说和散文。尽管不工，以量来说，以日计之，那是太平凡了。很多文人，伏在桌上，一口气就可以写三千字。而把八年的总和来计算一下，自己倒要反问自己，我怎么会写出这些字来？

我还记得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日本敌机群，八天八夜，对重庆作疲劳轰炸的时候，我在一座天然洞子外的竹林下，睡了三天三晚。白天怪心烦的，看上两页书，但并没有几个字，印到脑子里去，而嗡嗡然的机群声，又在远处云天脚下发生了。输入都不能够，还谈的上什么输出？又一个故事，茅草屋顶，被风吹去了，成了个小天井，仰在竹板床上，可以吟那句《卧看牛郎织女星》的诗。这“烟土披里纯”^①，并不怎么好。大雨来了，这屋顶天井，几条很长的水柱，向屋子里斟着天然水，地面就成了河渠。我吃饭写字的那间屋子，就在隔壁，雨点向桌上飘，文具全为之打湿。躲向屋里一张小方桌上写字，倒是躲开了水灾。而四川乡下那种小黑蚊，小得肉眼看不见，这时全涌进了屋子。半小时之后，不但两腿其痒难受，而且起疱之后，还相当的痛。这怎么能安心地写稿呢？

可是在这两个故事过去之后，我立刻就得写。不写怎么活

① 烟土披里纯：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下去？我自己对自己的稿子，笑着下了一个批评，就是榨出来的油。

五十三 胜利后的作品

自从“九一八”以后，脑力劳动，就没有得着水平以上的待遇。抗战八年中，这辈人是更苦。日本人的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了，大家都唱着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闻捷诗，我也是被这天上掉下来的胜利，冲昏了脑瓜。把写作生涯，暂时告一段落，预备东归以后，在半村半郭的地方，盖三间小屋，读书种菜，卖文课子，带着一群孩子们，实行我的口号，就是“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东归计划，除了回乡探亲一省七旬老母，不曾变更而外，其余是全推翻了。我还是住在都市里，我还是当一名新闻从业员。

在胜利以后，币制是一直紊乱，物价是一直狂涨，对于国民党的金融政策，谁也不敢寄予以丝毫的信用。这样，自由职业者，就非常的痛苦，尤其是按字卖文的人，手足无所措。因为卖文的人，都是把稿子寄出去，一月之后，才能接到稿费的。可是这就是个无比的吃亏。月初，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也许可以买个两、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半斤米都买不着了。有些收买稿子的报社和杂志社，体恤文人，也有半月一结账的，也有预付一部分稿费的，但这都不能挽救文字跟着“法币”贬值的命运。物价的跌跃，每月加百分之百以上，那是常事。稿费根本不能按月调整，就是按月调整，也不能一加就是百分之几百。所以对任何收买稿件的人，订好了稿约，总维持不了两个月。到了后来，几乎寄一次稿子，就必须商量一次稿费。多数人

如此，我也是这样。这种趋势，让写稿的人和收稿的人，都感到一种“过分的无聊”。既然无聊，这卖文生活，又何必去继续呢？

在这种情形下，胜利后的两年间，我试了一试卖文的生活，就戛然中止。所幸除了《新民报》经理职务的薪水而外，上海两三家书店的版税，依然是超过薪水的几倍收入，我不出卖稿子，也还不至于影响到生活。所以这期间，我只给《新民报》写了个长篇《巴山夜雨》，又给上海《新闻报》写了个长篇《纸醉金迷》，如此而已。这两部书，都是以重庆为背景的，在别人看来，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作了一个深刻的纪念。《巴山夜雨》在我收束之下，还没有把稿子重订，而时局已经变化了，只有将来再说。《纸醉金迷》在没有完篇的时候，已经被电影公司拿去作题材，上两个月，由我把上半部故事，编了一个剧本。这两年来，稿费的收入，可说是比抗战期间，无以加之。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纸价已经贵得和布价相平了。上海的书商，有了纸张在手，宁可囤纸，也不印书，因之我在上海出版的二、三十种书，全不再版。出版家虽也陆续的寄给我一些版税，较之三十五年，已不成其为比例。其初，我以为纸张的昂贵，影响到书的出版，这是暂时的现象，还忍耐地等待着，后来一月不如一月，我把版税当养老金的算盘，暂时就得搁上一搁，于是把那老话再拿出来，对家庭用度，要“开源节流”。“节流”除了吃的以外，一切以不办为宗旨，而“开源”只有多写文章出卖了。好在找我写稿子的人，倒是机会不断的。于是我又先后写了三个长篇是《一路福星》，《马后桃花》，《岁寒三友》。但这三篇小说，都因稿费的商榷，不能得着一个合理的解决，都没有写完。最后有《雨淋铃》和《玉交枝》两篇，都是因交通中断而停止的。

为了交通关系，我也觉得向外寄稿，写长篇是不大好的，我

很想改变作风，多写中篇。所以这两年以来，我很写了几个中篇，如《雾中花》，《人迹板桥霜》，及最近写的《开门雪尚飘》。这一试验，并没有失败，将来，也许我常走这条路。^①

五十四 伪 书

由我写那篇不知名的小说提起，直到上节为止，关于我的小说，可以作个总账交待了。这仿佛是篇流水账，无情趣可言。但要详细地知道我三十多年的写作，不能不这样的报告。现在在总账以外，对写作生涯有关的，我摘要的要找几件事说一说。第一件，便是张恨水伪书了。

民国三十二年，舒舍予的夫人到了重庆，因老舍兄的介绍，我们认识了。舒夫人是由北平到后方去的。见了面，不免谈起了一些北平的别后风光。舒夫人说了几件事之后，就提到我的小说，在华北，在伪满洲国出版的太多。她又笑说：“您不用惊讶，那全是假的，看过张恨水著作的人，一翻书就知道，那笔路太不一样了。”我当时相信事或有之，而伪书不会太多，及至我到了北平，据朋友告诉我的，和我在伪书底页上所看的广告，统计一下，实在让我大大的吃了一惊，这种书约有四十几部之多。这些作伪书的先生们，太和我捧场了，自己费尽了脑汁，作出书来，却写了张恨水的名字，这不太冤吗？不过一看了书的内容，甚至一看书的名字，就知道太冤的是张恨水，而不是作伪书者。记得这些书里，有一部叫《我一生的事情》。张恨水一生的事情，由张恨水自己写出来，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黄色小说。喜欢低级趣

^① 这期间尚有《五子登科》长篇，连载北平《新民报》，未完；一九五六年续完后出单行本。中篇《步步高升》亦连载该报。

味的人也好，好奇的人也好，怀疑的人也好，还有替我爱惜羽毛的人也好，少不得要买上一本看看。而作伪书者其计得就矣。我不知道这书里，把我糟踏成个什么人物，以这种手段和张恨水作伪书，那不仅仅是骗读者的钱，对张恨水是恶意的侮辱，乃是无疑问的。记得我当《新民报》经理的时候，经理室的工友，就拿了一本张恨水作的肉感小说在看。同事拿来给我过目，我除了向工友解释，请他别看而外，我就难过了两天。可是我没法子把市场上这些伪书烧了，除了听其自生自灭，实无第二良策。

凡是彻头彻尾的伪书，究竟难逃读者之眼，我相信它是会消灭的，至少是三、四年以来，已不再版了。所难堪者，却是半伪书。怎么叫半伪书呢？就是把我的书，给它删改了，或给它割裂了，却还用我的名字，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这都教人啼笑皆非。例如我在《晶报》上发表的《锦片前程》，我是没有写完的，上海就有一家书店给它出了版。除了改名为《胭脂泪》而外（改书的人，可能不懂《锦片前程》是什么意思），加了许多文字进去，而且把书足成。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而这位改写的人，就用的是空洞堆砌的美丽长句，时而通俗，时而高雅，这成何话说？又我写的《春明新史》，是用回目老套，也有人改了，改名为《京尘影事》^①，一回分为两回，一个回目管一回，把书分成两集。这样一来，章法太乱，不但文不对题，甚至下文不接上文，简直一团糟。俗言道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决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我想，社会上许多我的

① 《京尘影事》应是经篡改的《斯人记》，而不是《春明新史》。

神交，一定为我太息久矣！

我初回到北平的时候，有人问我：“你在重庆开了豆浆店吗？”我说：“何以见得？”他说：“日本人的报上，这样登的。”我笑说：“这是抬举我，我在重庆过的日子，远不如开豆浆店的老板。”牛角沱和海棠溪，有几家豆浆店，早上的生意之好，那还了得？我若能在重庆开八年豆浆店，我真发财了。但日本人原意，决不是抬举我，这和作伪书的人自己费笔墨，替张恨水出名，其用意是一样的。

五十五 我死了

提起我开过豆浆店的笑话，就联想到日本人传说我死了！这也很有趣。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民国三十年秋夏之间，乡居无事，又不免发点牢骚，作了若干首村居杂诗。其中有一首这样说：

茅草垂檐漾晚风，蓬窗斜卧一衰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这当然说的是另外一个衰翁（当时，我才四十几岁，既不衰，也非翁）。假如衰翁是我，我死了，怎么还能作出这么一首诗呢？除非是我死了又返魂，或者是有人扶乩，我降坛作诗。不然，这话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些村居杂诗，香港的报纸转载了，沦陷区的各处报纸，再转载了。日本人就神经过敏的，在我诗的后面，加上按语，说我死了，这是我的绝笔。意思就说：中国的文人啦，你们别抗战，抗战就同张恨水一样，饿死于重庆。

当今之时，文人发牢骚，实在也当考虑。记得我在重庆作的

一些打油诗或歪诗，凡是悲叹生活艰苦的，只要是登了报，不用多久，日本人报纸，就转载了。他决不是捧场，而是反宣传。记得某老悲痛他大小姐之夭折，以新四军之被解散，也曾吃过一瓶“奎宁丸”，这很给当时重庆文艺界一个刺激。报纸上不免宣传一番。而这事辗转到了日本人报上，就是加倍的渲染，也作了很热闹的反宣传。所以在这些关节上，文人下笔，倒是不可不慎的。

五十六 故事的利用

小说就是小说，并不是历史，我已经说过了。但例外的将整个故事拿来描写，这事也不能说绝无。若以我从事写作三十年而论，这样的事情也有两回。

第一回，我替《申报》“春秋”写的《换巢鸾凤》，就是有故事的，而且是受朋友之托的。在一个秋天，苏州的一位朋友，请我由上海到苏州去看菊花，并介绍许多苏州文人和我见面。我是个忙人，不能有此雅兴。不过那位朋友郑而重之的写了封信给我，叫我务必去一天。意思并不光是要我去雅叙一番。我就只好坐快车去了。朋友是亲自在公园的菊花会上，把我接到他家，他家也小有花圃，畅叙之后，他把我引到内书房，拿了他私人的许多秘密文件给我看，他说：这是他生平一件伤心事，在过渡时代，他和另一个女子为旧礼教牺牲了。这事虽已过去二十多年，但这心灵上的伤痕，却是不可磨灭。他希望我运用这个故事，作个反封建的长篇小说。我当时曾笑说，你何不自己写呢？他说，那会犯主观的毛病，会把主角写成两位圣人。我倒是赞成他的话，我就答应了下来，写了这部《换巢鸾凤》。可惜这书没有写成功，中日战起，就中止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写《虎贲万岁》，这已经交代明白了，不再赘述。不过《换巢鸾凤》和《虎贲万岁》不同。后者，我根据了参考文件，真名真姓真时间真地点，我都给他写出来了。前者却把这些都换了，只留下了那类似悲剧的故事。此外，有一半运用故事，一半是抽象的，那就是《欢喜冤家》和《大江东去》。《欢喜冤家》是间接的传来一个故事，那是可以反映出女伶的生活的痛苦，这是个社会问题。《大江东去》呢，一半是人家传说的事，一半却是主角自己叙述他亲身的遭遇。也是抗战中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两个故事都是生成的小说题材，我自然不会放过这种题材的，所以我都把它写成了。

底稿·尾声

文人写文的习惯不同，所用的工具，也各有不同。在胜利以前，我写散文，还不用钢笔，因为我写成了习惯，用毛笔并不比钢笔慢。但去年利用了报社里的破纸头印了稿子纸，因为比普通纸厚的多，我就试用自来水笔，结果，比毛笔快些，我就改用了钢笔了。但我向外寄的小说稿，二十多年来如一日，我总是用铅笔和复写纸。这样，寄出去的稿子，挑选那清楚的一份，而留下那较为模糊的，作为底稿，以便自己参考。我并没有估计到，在文字登过报或印过书以后，这底稿还会有多大的用处。到了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我发现底稿有用了。在四川江津的中央图书馆^①，曾写了两封信给我，问我写的作品，有多少底稿。他们希望我把这底稿捐赠给图书馆。但是在战前我写的底稿，早是

^① 指国民党中央图书馆。

片纸不存了。在四川写的底稿，虽然有，却是拿不出去。它是类似竹纸的夹江薄纸复写的。复写纸印出的一张，比较清楚，我都交出去了。留下来的是浮面铅笔写的一张，只有些清淡的铅笔影子，而且有些纸已经划破了。我只好函复江津图书馆无以应命。后来，我写《虎贲万岁》，因为不是寄给报馆的，就用毛笔写，全书完工，誊录了一份，拿去印书，自己保留着原稿。这要算是生平写作中最完备的一份底稿了。

写到这里，关于我的写作生涯，仅仅是直接和文字牵扯，我都已略略谈到。若要再详细的写，再写这么多的文字，未必可以谈完，我想适可而止，就此打住罢。零零碎碎写到现在，我也是粗分个大纲，想到就写，何者是读者所愿意知道的，何者是读者所不喜欢的，我不能知道。但我相信，这篇写出以后，对于爱好我小说的读者，总可以加进一层认识的，在我自己而言，应该不会是白写。其余的只好作覆瓿之用了。

总 答 谢

——并自我检讨

谢谢各位前辈，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文艺抗敌协会，谢谢新闻学会。

用甲子推算，今年是不才五十岁，又以试学写作（实在谈不上创作）的日子计算起，东涂西抹今已有三十四年。实行作新闻记者之日算起，今已有二十六足年。朋友们觉得我这辈子太苦了，要替我作五十岁，安慰一下。而把写作整数外的零头，加入当新闻记者的年月，则各得三十年。又要借贱辰和我作个三十年的写作与从业的纪念。我是乙未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当朋友打听我这个日子时，我总是瞒着。但我心里又搁不住事，日子久了，我终于说出来，“我是某日生，谁要和我作生日，谁就是骂我”。而朋友的答复更幽默，“我们就骂你一次”。这真无法了，我就预拟了个计划，学学女人，届时来个避寿，溜之大吉。

在这个过程中，一班老朋友，已暗暗地拟好了庆祝大会的节目。乃是《新民报》成渝两社，分在成渝茶会，几张刊物出特刊。而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不才是第一届理事，至今是会员。新闻协会以我是监事，又以我是同行中的一个老跑龙套，也要加入作茶会的主人。照说，这种光荣的赐予，我应当诚恳的接受。可是我想到物价的数字，我也立刻想到不应当由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浪费。而且我的朋友，不是忙人，就是穷人。对忙朋友，不应

当分散他的时间，对穷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法币，于是我变为恳切的婉谢。几位老朋友劝之不行，总实（是）说我过分的矫情。而且特刊的文字，都已预约好了，《万象》周刊，且已排版。无法，我只好默许了文字的奖励，当为拜领，其他一切仪式从免。朋友仍不许可，直到贱辰的前两日，依然僵持，而茶会请柬，已不能发出，方才罢休。可是成都方面的仪式，我又无法阻止，也只有遥遥地敬领了。

在重庆虽一切仪式无从实行，但朋友的盛意，我是万分感激的。而成都方面的仪式中，大概有许多是神交已久未曾谋面的朋友，尤其让我感谢。就是重庆方面，也有许多神交，纷纷到新民报社祝贺，致令扑空而回，更让我惶悚无地。至于过重的赠与，不敢捧领，当一一璧回。以上这些话无关文艺，我不能不有个交代，占去报纸许多篇幅，我是引为歉然的。其次，对特刊朋友的溢美的奖许，我愿借这个机会，自我检讨一下，更求以后长期的指教。

一、写述方面 不才写了三十四年的小说，日子自不算少，其累积到将近百种，约莫一千四五百万字，毋宁说那是当然，何况写作，并不重量，这无足为奇。关于散文，那是因我职业关系每日必在报载上若干字，急就章的东西应个景儿而已，有时简直补白作用，因之毫无统计，只当下了字纸篓。这个，朋友也替我算过，平均以每年十五万字计算，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约莫是四百万字。这就是朋友谬奖我二千万言的写述。若果如此，那末杂货店的流水帐，也可算作立言，三十年的时间，谁又不能拿出数十万字的文章来呢？此外，朋友又谈到我的词曲和诗。诗，我曾弄过一点消遣，从前，一年可写百十首，多近体，近七八年来，写诗比文人打牙祭的次数还少，无足称道。词，我是二十四岁才

学的，恐怕至今没有成熟。曲，我不懂音律，生平不曾填过十个散套，不知朋友怎会把制曲来许我？

我报过了量，再谈质罢。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鸯蝴蝶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决不象进步的话剧家，对文明戏三字那样深恶痛绝。

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我未加深辩。自《春明外史》发行，略引起了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一个感想，丢进了毛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

我为什么这样缄默？又为什么这样冥顽不灵？我也有一点点意见。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

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砖抛甚多，而玉始终未出，这是不才得享微名的原故），让我来试一试，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我向来自视很为渺小，失败了根本没有关系。因此，我继续的向下写，继续的守着缄默。意思是说，不必把它当一个什么文艺大问题，让事实来试一试，值不得辩论。若关于我个人，我一向自嘲草间秋虫，自鸣自止，更不必提了。

为了上述的原因，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原故。将近百种的里面，可以拿出见人的，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写完而自己感觉太不象样的，总是自己搁置了。也有人勉强拿去出版的，我常是自己读之汗下，而更进一步言之，所有曾出版的书新近看来，都觉不妥，至少也应当重修庙宇一次。这是我百分之百的实话。所以人家问我代表作是什么，我无法答复出来。

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以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

套子了。严格的说，也许这成了姜子牙骑的“四不象”。由于上述，质是绝不能和量相称，真是“虽多亦奚何为”？

二、从业方面 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对新闻事业，发生了兴趣。二十岁到汉口，有些朋友，正是新闻记者，因此我常写些不高明的稿子给他们补白。大概是旧诗、游记、戏评等类。直到二十四岁，我才到芜湖《皖江报》当总编辑，兼编副刊。那个时候，在内地当记者，用剪刀得来的材料，比用笔写的多百分之八九十。所以总编辑者，那是个纸老虎。同年秋天，我到了北平，本打算入北大作旁听生（许多人疑我是北大学生，其故在此）。但到了以后，在一个上海驻京记者那里帮忙，地在南城，到北大太远，原意暂搁，不久入北京《益世报》助理编辑，专职熬夜看大样，更谈不到求学。是后曾在世界通信社、联合通信社、《今报》当编辑，并继续在《申报》驻京记者处帮忙。《益世报》早已调我为天津《益世报》通信，同时，又为上海《申报》、《新闻报》通信，我又干上采访了。至民国十三年，入《世界晚报》编副刊，十四年兼编《世界日报》副刊，并曾一度任总编辑。十七年任北平《朝报》总编辑，到十八年，我在南北各报，特约的长篇小说增多，我才把世界日、晚报的副刊事务辞去。中间相隔一个极长的距离，到二十三年，我才任上海《立报》的编辑。二十五年，我在南京，自创《南京人报》，至南京撤退，报始停刊。入川后，在《新民报》编了两年副刊。以后只写写东西而已。根据上述的经过，我是内外勤及经理部都干过的人，透着职务不专。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我竟没有写过一本新闻学的书，未免太不长进。

写述三十四年，成绩如彼，当新闻记者二十六年，成绩又是如彼，朋友要和我纪念，我自己问心，不惭愧吗？假如茶会真开了，一个面白无须，身着旧川绸长衫的措大，在许多来宾中公然

受贺，那窘状是不可想象的。朋友说我矫情不如说我知趣。朋友，以为如何？虽然，十六日那天，许多老朋友终于请着夫人和小天使，不嫌长途跋涉，光顾到建文峰下，把三间茅屋涨破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我无法形容老友给我的温暖。“上苍假我数年”，到了六十岁以及七十岁，那时，我当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备一杯茶，请老友赏晚开的牡丹。或者在南京后湖公园，请老友吃樱桃，以补偿今日的慢待。

最后，对于《新民报》蓉社茶会，蒙各位先生赐顾，未能亲到道谢，并志歉忱。敬还祝一切朋友健康！

附 录

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友鸾

一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家。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

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扬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二三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 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

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 期

一九一九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

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一九二四年四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三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一九二五年二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刺。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

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城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象《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一九二九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挽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

《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一九三五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

读者的共鸣，有必要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多少是与革命有利的。

三 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国，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一九三六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一九三六年四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

《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进逼南京。十一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一九三八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山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

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钜构了。

末 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一九四八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一九四九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一九五〇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

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成了“强弩之末”。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

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 明 外 史》

《春明外史》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象“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象《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

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象《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象《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摘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一九三二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隐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象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在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

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

一九二五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像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

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个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事件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一九二九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的探讨。

《八 十 一 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一九四一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一九四二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

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账，《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人。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

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象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

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一九二四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一九二五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象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象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枝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枝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

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姑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

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一九三七年在南京，一九四九年在北平，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讹。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象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早上去世的，十四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

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自命为“哀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

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象《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

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一九四四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

……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入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进步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

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用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踰华袞之赠”。虽然当时是针对《八十一梦》而言，事实上他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同反动派作斗争”，只因写作时期有先后，矛头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贵族官僚，《啼笑因缘》指向北洋军阀，《八十一梦》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富有斗争性的，是进步的。为了祝贺张恨水五十生日，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精进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

的进步立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说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母”。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说，张恨水不属于礼拜六派，因为礼拜六派没有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具有进步立场，更不可能是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说明：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他是自由职业者：终身从事写作，多年的新闻记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他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读者自会发现，他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表示同意。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写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虽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好象去今未远，只因这个时期以内，我们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谁的思想也不会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们今天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当时张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这么严峻，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来，他的作品，终究是社会进步的催

化剂，应该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属于广大的读者，希望能够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1981.9.12 于北京。

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

张晓水 张二水 张 伍

父亲张恨水先生，笔墨耕耘几十年，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新闻事业。由于他才思敏捷，工作勤奋，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大量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光中、长篇小说就有近百部之多，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发表了两千多万字，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有十四个寒暑了，可是读者并没有忘记他。至今，国内外还有很多人在阅读、收藏、研究他的作品，探讨他的创作艺术。也常常有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向我们索取他的作品，询问他的生平。这些亲切的关怀，常常使我们回忆起与父亲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在眼前，使我们沉浸在一种惆怅和温馨的感情之中。

“恨水”笔名的由来

父亲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省潜山县，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农历）出生于江西广信（今上饶地区），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因而他虽然说的是“北京话”，但总夹杂着安徽和江西口音。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对小说、诗词的喜好已到了入迷的程度。十三岁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弟妹写了一部小说并自绘了插图。他

学习非常刻苦，常听奶奶对我们讲述父亲幼年勤学的情景：安徽家乡的夏天，炎热多蚊蚋。他足不出户的闭门苦读，从清晨到深夜，吟哦之声，琅琅不绝。农村人习惯早睡，每到天一黑，所有的房间都熄灯了，只有他仍然独对孤灯，把卷夜读。蚊虫见了灯亮，一齐扑向父亲，咬得他浑身是包，痛苦不堪。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大木桶打满了清水，把双腿泡在木桶里，蚊虫奈何他不得，而他也就可以怡然自得的读书了！

说起父亲的勤学，就要联系到他的笔名来了。很多人都奇怪，他为什么要叫“恨水”这么一个名字？又为什么别的不恨，偏偏要“恨水”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寓含着一段深意的。他幼年就酷爱词章，当他读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从中悟到了光阴的可贵，于是就截取了“恨水”两字，作为他十七岁时在苏州第一次投稿的笔名，这样就能随时听到、看到自己的名字，可以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让光阴象流水一样的白白流逝。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父亲律己是多么的严格！

从芜湖去北京

一九一九年，父亲在安徽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那年他只有二十三岁。“五四”运动爆发了，他非常兴奋。虽然他绰号叫“大书箱”，可是对运动还是颇为关心，他对我们回述这段往事时说：“那时候，我们都很幼稚，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可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在我的倡议和主持下，在报

上办起了周刊一类的东西。经理看着我们办，并不说话。”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父亲想去北京的心，又怦然而动了。

父亲在《皖江报》的工资，每月八元。有些朋友就鼓动他说，你有这样好的笔墨，为什么不到大地方去闯一闯呢？由于祖父的早逝，父亲想去欧美留学的愿望落了空，早就想寻机会到北京大学去深造，又听了朋友的鼓动，于是，就卖了仅有的一件皮袍子作路费，还多亏了一位卖纸烟的老伯伯帮助了一些川资，就这样于一九一九年秋，只身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开始在《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晒处工作，住在潜山会馆里。那时候，北京有许多会馆，这是类似一种同乡会的组织和同乡聚居的公寓，可以不交房租。许多到京谋事和准备升学的穷文人，都住在这会馆里，久而久之，有的人就在会馆里安置了家庭。因而住在会馆里的人，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段会馆生活，使父亲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有机会了解、熟悉北京的底层生活，这对于他以后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父亲那时的工资是每月十元。秦墨晒先借给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他一拿到钱，就马上寄还给芜湖那位卖纸烟的老伯伯。还剩下一块钱，作什么用呢？第二天恰巧有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位著名演员联合演出，他把仅有的一块钱买了戏票。父亲常常和我们提起这次倾囊听戏的往事。初到北京，工资微薄，又举目无亲。父亲的生活，当然是挺清苦，在工余，他就益发在会馆里用心读书。那时他正在苦攻《词学全书》，免不了照谱填词，这些词都是学习之作，并不准备发表的。一次他填了一阕词，偶然被一位姓方的同乡看见，就把这阕词拿走了，父亲也没有在意。不料这阕词被成舍我看到了，大为赞赏，见词而想见其人，就辗转托人把父亲请到了《益世报》，从此帮他办报十几年。这阕

词我们曾听父亲读过，可惜年代久远，现在只记得头两句：“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仅此也可以看出他少年时期的飘泊与困厄。

一九二四年成舍我创办北京《世界晚报》，父亲主编副刊《夜光》，发表了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篇小说对当时官场和社会怪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诗词歌赋穿插其中，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据一些资料记载：当时读者为了读这篇小说，每天下午两点多钟，就有人在报社门前等着晚报出版，为报社增加了不少收入，因此，有人说张恨水为《世界晚报》出了力，立了功。

次年，《世界日报》创刊，父亲又主编副刊《明珠》，发表了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同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情况和《春明外史》差不多。父亲编这两个副刊，几乎是唱独角戏，编排、校对都是他一个人。初期外稿不多，除了写这两部都有百万言的小说外，还要写不少诗词、散文补白。后来他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在报上登广告，公开招考特约撰稿人，由父亲亲自考试、选拔。报名的人很踊跃，但他只选中了张友渔、马彦祥等四人。

一九二九年，父亲为上海《新闻报》撰写了《啼笑因缘》，就被世人所知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十多年时间里，父亲都在北京给报馆写小说、写文章。他喜爱北京，喜爱她的历史文化，喜爱她的淳朴民风，把北京视作他的故乡，可是他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了北京。

被迫离开了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慨。他开始思考：在这国难

当头之际，该作些什么呢？他认为自己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虽然“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一枝笔，可以用这枝笔作为武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使他在作风上和写作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他力所能及的在诗、文中宣传抗日，而且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开始写抗日小说。他自己写作、出资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他在《弯弓集》序中说：“……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供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父亲眼看“寇氛日深，民无死所”，“心如火焚”（引号中原话均见《弯弓集》序），他在《弯弓集》的《健儿词》中呼道：

含笑辞家上马呼， 耆番不负好头颅；
一腔热血沙场洒， 要洗关东万里图。

在《咏史诗》中借古讽今的说：

六朝金粉拥千官， 王气钟山日夜寒；
果有万民思旧蜀， 岂无一士复亡韩。
朔荒秉节怀苏武， 暖席清谈愧谢安；
为问章台旧杨柳， 明年可许故人看。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

背上刀锋有血痕， 更未裹剑出营门；
书生顿首高声唤， 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 女儿志比泰山高；
却嫌脂粉污颜色， 不佩鸣鸾佩宝刀。

这一时期他还写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后易名《杨柳青青》）等抗日小说。父亲是个书生，没有上过战场。他为了写好《东北四连长》，搜集了许多资料，并且找了他一个当过义勇军的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军事生活，这样合作了两三月之久，才动笔开始写。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本帝国主义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父亲于一九三五年秋被迫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北京当时称为北平）。

腰 斩 之 作

父亲离开北平后，应成舍我之约，主编上海《立报》副刊《花果山》，并且还写了一部悲剧性的小说《艺术之宫》。他很看不惯上海的十里洋场生活，在合期将满之际，就准备离去。这时北平已出现了冀东汉奸傀儡政权，迫害爱国的文化界人士，日本帝国主义开有一张黑名单，父亲“榜上有名”，北归不得，只好改道南京，他曾有诗：“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指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在南京时，和张友鸾叔叔创办《南京人报》，父亲任社长，主编副刊《南华经》，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在《南华经》上连载。《南京人报》办得很兴盛，当时颇为轰动。父亲是一个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文人。他反对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他的小说和诗文都发表在民营报纸上，从不为旧社会的官方报纸写稿，因为他非常厌恶国民党那套歪曲事实的陈词滥调。一九三六年在

南京，他的《世界日报》老同事硬要他为当时的《中央日报》写小说，父亲本来坚辞不写，后来一想，借这个机会写一篇抗日小说讽刺一下《中央日报》也未尝不可。于是就写了《天明寨》。那几年父亲业余时间正在研究太平天国的史料，就利用了太平天国的逸事，宣传御侮抗敌。《天明寨》是用的历史题材，倒也“安然无恙”。登完之后，又写了一篇关于义勇军的故事。名叫《风雪之夜》，是以北平为背景的。在报上连载四、五个月之后，却接到总编辑一封信，说“奉命停刊”，干脆就是《风雪之夜》被“腰斩”了！当时抗日是有罪的，被“腰斩”也是意料中的事。其实《风雪之夜》并不是父亲的第一篇“腰斩”之作。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荆棘山河》，就因军阀张宗昌的武力镇压，而半途夭折。以后，《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多次来约父亲写稿，父亲再也不愿讨“腰斩”的没趣，不再为他们写一个字。

就在《风雪之夜》“奉命停刊”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军事侵略。强烈的爱国主义使父亲大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他虽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可是为了祖国，为了中华民族，他情愿马革裹尸，战死疆场。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吏们，的确有“六朝金粉”的士大夫味道，仍然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父亲看到这一切，愤怒的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日帝飞机空袭南京，父亲和报社的同事为了宣传抗战，坚持把《南京人报》办下去。没有工资照样发稿，没有外稿就自己动手写。当时我们的家住在南京郊区，父亲每日进城都要遇到空袭，他就在炸弹炮弹的交织中，随便伏身路边田坎下，炸弹扔过，立即奔向编辑部，处理当日的稿件和版面，就这样苦撑到南京沦陷的前四日，才不得已停刊了。为了抗

日，父亲毁家纾难，抛弃了他的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搜集，视如珍宝的资料和书籍，把家人送回故乡潜山，毅然只身入川，随身只携带了一个柳提箱。

途经武汉时，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在这以前，他是从来不参加任何文化团体的，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请 纓 无 路

父亲在南京的时候，看到许多爱国青年，不忍见祖国大好河山的破碎，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他们情愿抛头颅洒热血战死沙场。可是这些人爱国有心，报效无门。父亲十分愤慨，难道爱国也有罪么！在武汉时，父亲见国事日非，忧心忡忡。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印刷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当时也有一些同乡青年，有此主张，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父亲一听怦然心动，非常兴奋的同意了。他虽然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可是他愿意“投笔从戎”，他想扔掉笔杆，拿起枪杆回故乡打游击。于是立即亲笔写了个呈文给当时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去这么办，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发生误会。结果呢？被拒绝了！父亲请纓无路，大有为爱国而发狂的感受。由于这种愤慨，所以到了重庆之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疯狂》，就是这种心情的发泄。然而受到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已与原意有很大的出入了。

事后，我们常听家里老人谈到父亲“投笔从戎”的往事，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这样一个文弱的书生，架起老花镜拿枪打仗

会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看到父亲在听这段往事时，微笑不答的清癯面容，我们感动了，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提到打游击，父亲曾多方面搜集材料，采访座谈，写了好几篇这方面的小说。计有：《巷战之夜》、《红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除掉在香港《立报》发表的《红花港》和《巷战之夜》得以完篇，其余的几部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写完。《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更因触犯了当时安徽统治者的政策，也被宣告腰斩。

父亲写游击队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更加积极搜罗材料。令人感动的是，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就热心的支持父亲写有关游击队题材的小说。《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对父亲的要求无不答应，允许他任意索观有关文件。父亲看了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争，认为可歌可泣，十分感动。

父亲不躲警报

重庆多雾，冬春之际，浓雾迷漫，伸手不见五指，是令人头疼的事。可是当云净天清，风和日丽之时，那就令人不禁头疼而且可怕。因为只要是晴天，或月儿高悬，或阳光和煦，日帝的飞机必来狂轰滥炸，群众就要躲警报。每逢警报拉响，母亲就带着我们躲防空洞。而父亲呢，则从不躲防空洞。他不愿意在嘈杂的防空洞里浪费时间，他总是带着书本到茅屋后仙女峰僻静的地方，看书学习，遇到晚上有警报，他就干脆吹熄菜油灯，独自在茅屋静坐构思。

有一次，日帝飞机在我们住的小村里，大炸而特炸，在防空洞里可以清楚的听到飞机沉闷的嗡嗡声，也听到炸弹落地的轰

隆声！我们非常担心独自在山上的父亲的安全。等警报一解除，我们立即奔回家里，看到父亲已伏在那破书桌上疾写起来。他对我们说：“我在山上亲眼看到了日机施暴的罪行，要记下这笔账！”我们觉得父亲很勇敢。

四川山乡的景色是美丽的。我们所居的茅屋，前面是建文峰，后面是仙女峰，山上松柏修篁，四季常青，山谷中开遍了深红浅紫的野花，微风徐来，芬香袭人。清晨，山腰中盘绕着薄薄的云雾，在朝霞的辉映下，似纱似岚，好看煞人。这时，你会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在这寂静的山谷中，伴随着晨曦，不紧不慢的念英语，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响震山谷，和着缕缕的炊烟，成为南温泉桃子沟的奇景之一。这位老人就是父亲，他永远是我家睡得最晚而起床最早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自修英语，虽然这时父亲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而那种刻苦学习英语的毅力，真是惊人！

父亲是勤学的人，少年如此，老而弥笃，就是患了脑溢血症后也还是手不释卷。他以前工作忙，总不能集中时间看书。晚年他发奋要读完有两千五百多本的《四部备要》，这个“功课”他从不间断。从第一本读起，一直读到他的逝世前夕。我们发现在父亲长逝时，放在他床边的就是《四部备要》！写至此，我们不禁又泪眼模糊了！

“待 漏 斋”

南温泉的三椽茅草房，原来是“抗敌文协”的房子，后来“抗敌文协”迁走了，就让给父亲搬进去住。因为重庆是住房难，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因而周围住的都是“文化人”，老舍先生曾

和我们比邻而居，常和父亲来往，老舍先生一口纯粹幽默的北京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过四川的人都知道，重庆冬天寒冷而潮湿。山路泥泞，阴霾的天空如铅板一样，平平的盖在顶上。就是白天也是昏暗无光的，父亲写稿子用的那盏菜油灯，又时常受油价上涨的威胁，能不点就不点，省一点油，要留着深夜给小妹妹把尿用。

父亲的一袭蓝布长衫，经年不改，穿了洗，洗了穿，说蓝布衫其实已经是灰白色的了。遇到开规模较大的会，或是被大学请去讲课，父亲就把一件收藏多年的旧马褂套在长衫外，这倒不是为了“绅士”风度，而是为了“遮丑”，因为父亲的长衫，久经搓洗，胸前破有数洞，套上了马褂，一可御寒，二可藏窘，而马褂又是在旧货摊上贱价购得的，父亲说，“人弃我取，实在取暖”。

《新民报》社址在重庆市，而我们的茅屋，远离市区三十里。父亲为了工作，只好步行于重庆与南温泉之间。这条路要在海棠溪搭船过江，还要挤公共汽车，年纪大了，挤车困难，更不愿看公路局售票处的脸色，干脆爬山！父亲不坐车，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又可锻炼身体，三来还可借此了解一下民间疾苦，虽然辛苦，他也乐此不疲。抗日时期，重庆物价一日数涨，买米是困难的。为了一家人的吃饭大事，父亲往往还要从市里背着几十斤重的“平价米”，撩起长衫，过山涉水，彳亍于险峻仄窄的山间小道上。当我们看到山湾处，显出父亲的身影，就会迎上去。父亲微喘着，脸露笑容，放下那包“平价米”，母亲看着父亲，接过那包“平价米”，微微的发出一声叹息。这一放一接之间，蕴育着多少无价的关怀，这一声微微的叹息，又内含着多么沉重的辛酸！

我们所居的茅屋，是竹片夹泥的墙，房顶上的草，即是山上所生的茅草，这种房子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只要轻轻拍一

下墙壁，全屋就会微微颤动。大雨一来，屋内雨流如注，雨一停，而屋内也仍然是小细淅淅。久而久之，那里漏水就有个数了，有道是“未雨绸缪”，每逢阴云四合之际，父亲就和我们把盆盆罐罐预先放好，等待雨漏。故此父亲就幽默的为此茅屋取了一个非常富丽的名字：“待漏斋”，当然这个待漏与朝臣陛见的“待漏”滋味可就大不一般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离我们“待漏斋”不远的山对面，在绿荫掩映，花木扶疏中，有一座华美无比的西式楼房，宛如人间仙府，这就是有名的“孔公馆”。其实这座“孔公馆”主人孔祥熙根本不来，里面住的不过是他的副官仆役之类。父亲气不过，就写了一副对联：

闭户自停千里足
隔山人起半闲堂

贴在墙上，以为补壁。

父亲在旧社会中，是洁身自好的。他看不惯旧官场中的宦海浮沉，尔虞我诈，从不趋炎附势，只靠一支笔，来抚养我们兄弟姊妹，同时也抚养了他的弟妹们。父亲发表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以后，有些朋友看他太清贫了，劝他改行入宦途，有些作官的也来拉他，这些规劝、硬拉，父亲都“谢绝”了，他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不用“造孽钱”。父亲曾在一九四〇年写诗述怀：

不食嗟来四十年，戴将白眼看青天；
解嘲本属寻常事，莫把文章事乞怜。

生活的贫困，并没有压倒父亲，他仍然一心扑在写作上，扑

在工作上，他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毫不动摇。父亲用南宋爱国诗人的“北望中原泪满巾”之句，给自己的卧室、写作室兼会客室大书了“北望斋”三字，期待着早日收复国土，早日胜利！

《八十一梦》的前后

抗日战争，本是国难临头，大敌当前。可是重庆的国民政府，腐败贪污，特务横行，商人投机，都大发其国难财。这些事实，使父亲痛心疾首，要替人民呼吁。他认为，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谋求生存的问题，但是民众没有起码的生活，就难以争取永久的生存。这一时期，他又从写抗日游击战，改为写生活问题。如《牛马走》（后易名《魍魉世界》）、《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等。由于当年的“新闻检查”，父亲下笔要受到很大的掣肘，为了使自己写的东西避免“登不出来”，就使出了“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写了《八十一梦》。因为是“说梦”，就放开手，泼墨挥笔，把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嬉笑怒骂的揭露出来。《八十一梦》写于一九三九年，同年十二月一日刊于重庆《新民报》，从构思、立意、文笔和效果上说，父亲都比较满意，认为是“痛快之作”。其中的《我是孙悟空》、《天堂之游》等，都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共鸣。例如书中写了一个豪门，有一条路通到半空，路尽处的门是一个大金钱，上写“孔道通天”；孙悟空和一位戴有黄金、白金、赤金、钻石、宝石戒指的通天大仙斗法而失败。明眼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自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八十一梦》揭了孔祥熙的底，是个“漏子”，朋友们都为父亲捏一把汗。

有道是“不平则鸣”。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只不过替老百姓鸣一鸣，不想为此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认为张

恨水“赤化”了，来往书信受到检查，行动也受到监视。为了这部书，某人还专门把父亲接到了一个华美的精舍，酒肉招待，最后他问父亲：“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国民党特务监狱）去休息两年？”在这种种情况下，父亲被迫把《八十一梦》结束了。父亲的愤慨是可想而知的，他并没有屈服，还是要“为民而鸣”，在后来单行本的《楔子·鼠齿下的剩余》中说：“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缘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些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把它的牙与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在《尾声》中说：“本是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残了，不能全部拿出来”，指的就是这件事。

《八十一梦》的斗争作用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一九四二年秋，周总理接见《新民报》的主要工作人员，有父亲在座。周总理询问了他们工作中的困难，给予支持和鼓励，接着风趣的对父亲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周总理的肯定与勉励，使父亲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写《八十一梦》的同时，父亲还写了许多诗文，比如连载的散文随笔《上下古今谈》等，也是力求反映这种思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宣传什么“一滴汽油一滴血”，加紧对人民进行勒索，而那些高官政要和夫人之流，却豪华奢侈，挥霍无度，父亲曾写了一首讽刺诗：

荒村细雨掩重霾，警报无声笑口开；

日暮驰车三十里，夫人烫发进城来。

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所以流传很广，各报都有转载。

说起《八十一梦》险些使父亲进了特务监狱，无独有偶，《啼笑因缘》也招来了同样的祸事。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啼笑因缘》出单行本的前后。当时我们住在北平未英胡同。一天，来了一位身穿军装的×××的副官，拿着名片要见父亲，并且“邀请”父亲即日随他去奉天×××家作客。父亲知道是推不掉的。遂到后院与家人告别，说：《啼笑因缘》出事了，×××认为刘将军是写他父亲，要我去奉天一谈，此去可能是凶多吉少，大家要有个准备，万一出了事，向朋友告借，举家南迁。全家慌做一团，母亲不知所措，倒是父亲很镇静，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同那位副官到了奉天。×××晚上在家与父亲“洗尘”。席间问到了《啼笑因缘》的创作经过，父亲说沈凤喜是实有模特儿的，刘将军则是虚拟的，不是指的那一个人，而是在许多军阀中抽其共性塑造的。×××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听了父亲的话，一笑了之。数日之间盛情招待，并约请奉天的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相会，临行时又送了一些土特产，没有想到，经此一会，他们两人倒成了朋友。

一套中山装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主席飞抵重庆。父亲经周恩来总理介绍，认识了毛主席。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曾经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另一次则单独召见父亲，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很关怀父亲的生活，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且还和父亲谈论了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父亲告辞时，毛主席

送给父亲延安自制的呢料和红枣、小米。

父亲回到南温泉，很兴奋的对母亲说：“这是延安的小米、红枣！”母亲从小在北京长大，很怀念北方风味，赶忙给我们熬了小米红枣粥。那是我们兄妹第一次喝小米红枣粥，不但觉得香甜可口，而且还带着几分神秘感。

我们听见父亲低声的对母亲说：“毛先生（当时对毛泽东主席的尊称）有渊博的知识，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当时都很幼小，不懂得小米、红枣的意义，父母亲就比我们想得深远了。难忘的小米红枣粥！

那块呢料，父亲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开会时，他总爱穿这身中山装。

父亲一向是穿蓝布衫的。有了那套中山装，只要时令适宜，父亲参加会议或宴会，总是穿着它。后来衣服的颜色褪落了，父亲就改染成藏青色。五十年代的一个春节，全国政协举办团拜会。因我家离政协礼堂很近，父亲穿了那套中山装步行前往。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客人，一眼认出了父亲，一步上前，握着父亲的手，问候工作和病情。周总理看着父亲穿的中山装，问：张先生的生活有困难吗？父亲马上领悟到总理因这套染了色的中山装才有此问，就说：我生活挺好，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这套衣服，总理没认出来？一九四五年总理陪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毛主席送我一袋小米和红枣、延安产的粗毛呢。小米、红枣是吃了，这呢子衣服我可经常穿在身上呢！总理哈哈大笑，说：不错，你把颜色染了，我没认出来。好，好！你没忘旧。

参加会议回来，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一个国家的总理，有多少国内外大事需要他去处理，可是从一个普通作家的衣着上，都使周总理联想到他的生活

和工作上去！

关于父亲和毛主席的交往，还有这样一件事：

一九四五年初冬，有人给父亲看一阙词：《沁园春·雪》。送稿人说明这是毛泽东主席所作，愿意先在《新民报》刊登，并希望父亲和一阙。父亲接过来一看，觉得气势磅礴，非同凡响，知道这阙词是不能随便和的。那时父亲是重庆《新民报》负责人，就把原词照登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上。署名毛润芝。过了一天，这阙词才在《新华日报》发表。轰动了山城。

书、画、花、棋

父亲的一生都是忙碌的，工作非常紧张，简直没有休息时间。可是他仍有许多业余爱好，这些爱好，虽然都不算精，但都够“专门”水平，有的造诣还颇深。我们实在奇怪，他是怎么“忙里偷闲”学来这些爱好的？

父亲有许多好看的画，好看的颜色。我们幼年时期经常去翻阅他书架上的“画书”，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花、山水、人物，看到了心爱的，就临摹下来，所以在我们兄妹当中，喜欢美术的颇不乏人，两个妹妹中一个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终和“丹青”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个叔叔也是学绘画的，擅长花卉与草虫，三十年代还颇有点名气，这都是受了父亲影响的结果。父亲喜欢画，而且画的相当不错。朋友来了，谈起文学创作，他不过尔尔，若谈起画来，就眉飞色舞的滔滔不绝。有一次我们听他和老朋友议论，有的人以为父亲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父亲自己说：“都不好，我的画

好。”父亲曾在三十年代创办了北平“北华美术专门学校”，任校长，并兼授中文课，他请了许多老友到校教课，于非闇、李苦禅、王梦石等先生都在校任过教，学校办的也很有影响，象著名的张仃、蓝马等都是北华美专的学生。

父亲的书籍都是自己整理，不许别人插手。他的书很“杂”，除了一套系统的《四部备要》外，什么书他都搜集，简直是一个“百宝囊”与“杂货铺”，各种各样的字典，中外小说，县志，佛学，岁时志，字帖，笔记杂闻，……种类繁多，甚至连什么官职考、衣服考、胡琴工尺谱、花诀、棋谱他也搜集，研究考证，每逢我们遇到什么疑难，去问父亲，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说了不算，还要告诉你典出何处，那部书是怎么说的，接着他就象“变戏法儿”似的，在那卷帙浩繁的群书中，顺手抽出来，翻着给我们看。母亲取笑他是“书呆子”兼“活字典”，书上的东西都懂，可是葱卖多少钱一斤，他就一窍不通了。

父亲喜欢花。每逢写作累了，他就到小院子里给花浇浇水，松松土，这就是他最好的休息了。父亲养花并不要什么名贵的花卉，草花野花他都喜欢，他连大白菜都能做成简单的“吊花”。春天，他总到白塔寺去买花籽，自己松土，自己种。父亲的“莳花”不许我们插手，可是他却允许我们的长兄和大妹妹协助帮忙。夏天院中的群芳竞艳，姹紫嫣红，清风徐来，香气扑人，给小院增添了不少的生趣与温馨。

春天父亲去景山赏牡丹，夏天邀我们去西郊观荷，秋天则必去中山公园看菊，故宫御花园里玉兰花前，北海琼岛的丁香花下，都有父亲流连忘返的身影。

父亲说自己不会下棋，可是我们知道他会下象棋，围棋下得很不错。他有很多棋谱，写作累了，往往一个人，对着棋谱摆子，

棋子叮叮，独自下得也很有趣。小弟弟八、九岁时，父亲教他下象棋，小弟一学就会，而且“棋艺大精”，一定要父亲让车、马、炮，一老一小，也可以鏖战一两个小时。

父亲喜欢看电影，也喜爱各种戏曲，尤爱京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学会了拉胡琴，而且是“无师自通”，他的胡琴纯粹是“按图索骥”，照着工尺谱自己练会的，偶而兴来，高歌一曲，有时还要我们唱一段。说实话，父亲的胡琴并不高明，但是并不会错，尺寸、节奏都对，该托腔的地方，一定不忘“垫头”，真是怪事！他还会吹箫、弹月琴，他说：“我的月琴虽弹得不高明，可是有名师传授，是刘天华教的。”父亲年轻时和刘半农先生很熟，一起演过话剧，以后又认识了刘天华先生，就向刘先生学了月琴。父亲对我们说：“这些业余爱好，对写小说是很有帮助的。”每逢想起和父亲度过的愉快时光，都使我们沐浴在儿时的幸福中。

七 老

父亲年纪大，病后行动不方便。父亲的老朋友便常来看望“老大哥”，他们聚在一起，热闹非凡，笑声、辩论声充溢着小小的书房，他们研究古典文学中的问题，版本、作者身世、典故来源等等，各抒己见，常有妙解，父亲则总是默默的听着他们的争论，听到会心处，便嘿嘿的笑了。我们非常愿意听这些叔叔们的高谈阔论，其中的知识，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从这些讨论中，是得益非浅的。

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些老人来看望父亲，怕给父亲添麻烦，所以都带个菜来聚会，到时揭开饭盒，湖北味、江苏味、安徽味、四川味、广东味，各地风味聚在一桌。这些叔叔

们，为了陪伴年迈行动不便的父亲，把偶而得来的佳肴共享一乐，老人们仍保持淳朴的童心，给父亲的温暖和友谊，则是作子女所不能的。

一九六〇年的冬天，这些老人又在我家聚会，新开的梅花正吐着幽香，窗外雪花飞舞，左笑鸿叔叔即席填词，其中下半阙为：

“座上七翁都健寿，杯中酒泛流霞，窗前六出正飞花。梅开三五点，春到万千家。”

座上七翁即：吴范寰、季迺时、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张友鹤和父亲。除七老外，陈铭德、邓季惺、方奈何、施白芜等几位叔叔也常来看望父亲，都是报界同行。

有一次我们请这几位叔叔签名留念，谁先谁后，总免不了有一番谦让，风趣的左笑鸿叔叔说：“大家不要客气，谁的血压最高谁先写。”张友鸾叔叔不依了，说：“还是谁最近视谁先写。”这下可乱了套了，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最后还是父亲解了围，谁的年龄大，谁先签名。可是我们终究搞不清那位叔叔的血压高，那位眼最近视。

老人们开起玩笑来，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寓庄于谐。讲几则小故事：

一九二七年友鸾叔结婚，张婶与张叔同学。是时，张叔正在研究《西厢记》、《牡丹亭》，张婶恰姓崔，巧合得有趣。所以父亲写了一阙贺词，其中有“银红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就是暗切这件事。到了张叔七十寿辰那天，左叔想起前事，也写了一阙贺词，打趣张叔、张婶是“依旧张郎，依旧崔娘，白首相聚志更香。”看着儿孙满堂的张叔、张婶，令人忍俊不禁。

一九一九年，父亲在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那时父亲只有二十三岁，精力很旺盛，常常工作到大半夜，郝耕仁老伯到编

编辑部去玩，就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阙“丑奴儿”嘲谑父亲：“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痠，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父亲看了立即于纸角答了半阙：“一刀一笔一浆糊，写也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两人相视大笑，父亲的文思就是这样敏捷！还有一个趣闻。父亲初在北京时，和曲学大家吴梅（瞿安）先生常有往来，以后和吴先生的得意弟子卢前（冀野）叔叔更为稔熟，在一起研究元曲、传奇，并经常唱和度曲。卢善歌能饮，是一个大胖子，爱唱《醉打山门》，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二十二、三岁就作了金陵大学的名教授。

一九三六年，左笑鸿叔从北平到南京。父亲作东小聚，座上有友鸾、冀野几位叔叔。酒过三巡，友鸾叔忽然高谈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吟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的菜，一语双关，举座闻之大笑。

孝顺的儿子 民主的老子

父亲常对我们说，他是一个不幸的“过渡人物”，少年时期生活在清朝，深深懂得封建教育的可悲、可痛，他愿极力作一个“民主的老子”。父亲从不对我们进行体罚，每逢我们幼年时期作错了事，他也从不厉言疾色的呵斥，而是晓之以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比乱骂一通，乱打一顿要有效的多。从我们的孩提时代起，父亲就教育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要作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父亲对我们的职业、婚姻、兴趣、爱好从不干涉，他认为这是孩子们自己的事，作父母的不必多管。因而在我们兄妹当中，职业是多种多样的，有研究自然科学的，有搞社会科学的，也有从事文艺的。但是有一条，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他认为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懂得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是不行的，要有起码的知识。他说，要学通中国文学，没有坚实的古文基础，是学不好的，背不下一两百篇有代表性的古文，就入不了门。你们如果有兴趣，我来教你们。父亲果然是“言必行”，他的写作和工作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每次晚饭后，他都准时在写作室里等我们去“上课”。父亲给我们讲《史记》由列传入手，这样可以引起我们对古文的兴趣。以后又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唐诗合解》等书。有一次我们兄妹当中有人正在学陶潜的《归去来辞》，在院子里背课文，不是丢了上句，就是忘了下句，怎么也背不下来。父亲听见了，从屋子里走出来说：“背诵固然不可偏废，但是这样死背可不行。首先要理解文义，知道这篇文章好在那里，说的是些什么？这样背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多少年以后，还能奔赴笔底。《古文观止》是我八、九岁时读的，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我还能背得下来，你们可以任挑一篇让我背，不信，可以考一考我。”我们也是好奇，就让父亲背一篇《归去来辞》。父亲毫不犹豫的就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背起，虽然他病后说话很吃力，可是背起书来却毫不间断，不错一个字，不漏一个字，一气呵成将全篇背完。我们简直听呆了，父亲看我们惊愕的样子，就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小时候下的苦功。”正是由于父亲的“启蒙”，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都有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除掉书，不记得父亲还送给过我们别的

什么礼物。每逢他上街归来，总是抱着一摞摞的书，有些是他自己看的，其余的都是给我们买的，这些书，根据我们的年龄和学识，也是五花八门，从《少年文库》、《名人传记》到《诗韵合璧》、《芥子园画谱》、褚遂良字帖等等，应有尽有。父亲的书，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也是这些书，启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让我们去探求那无穷无尽的精神宝藏。

父亲偶而也带我们上街。随父亲上街，若说是玩，还不如说是“上课”更恰当。每逢遇到一座寺院，他就会引经据典的告诉你，这座庙修于什么年，有什么特点，经历过什么沧桑等等。走过一条小胡同，他也会告诉你，这条小胡同有过什么经历，什么传说，顺便就讲起了北京街道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北京街道叫“栅栏”，叫“井”的多，就从明、清讲起，又讲到胡同，他说“胡同”这个词是外来语，是元朝带来的蒙古语，又告诉我们哪些书上有记载。有一次我们听见小孩唱北京童谣：“王八驮石碑啰！”父亲对我们说，驮石碑的不是王八，是龙。叫鼉。然后又说这个传说在什么书上，可惜，那些书我们都不熟悉。我们真奇怪，父亲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

要路过书摊，那就糟糕了！父亲便会过去翻阅书，翻着翻着就把我们忘了，我们又不便催他。在不耐烦的等待中，也会自然的翻阅书摊上的书来消磨时间，久而久之，从中得到了一种很大的乐趣，所以在我们兄妹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逛旧书摊！

父亲有观察事物的习惯。他虽然一向不喜欢和商人打交道，但他买东西还要和那些商人扯几句，或者在旁注意地听做买卖人的谈话。有一次，父亲去给母亲买橘子，因为母亲喜欢吃酸甜的食品，如酸梨、杏脯、山楂等等。所以买橘子时，父亲问卖橘人：“酸吗？”那是一种酸橘子，父亲特意挑的，可是小贩犹疑了，

说不酸吧，不符合事实，说酸吧，又怕没人买。于是说：“您自己尝！”父亲被这巧妙的回答引得哈哈大笑，他那特有大嗓门的笑声，感染了我们，也感染了小贩，大家都一起笑起来，引得路人为之注目。父亲买了橘子回来，一路走一路说：“妙，妙！这是很精彩的文字语言。”

父亲在衣着、饮食上非常随便，他不会赌博，也不会喝酒，可以说是滴酒不入，虽然父亲的朋友中，有许多善酒的人，他也愿意看别人喝酒，可是他自己绝不开戒，连啤酒都不喝，怕耽误工作。父亲自称：有“三不能”和“三不精”，三不能即：饮酒、博弈、猜谜。三不精即：书法、英文、胡琴。“三不能”是实情，“三不精”到未必不精，他的书法、英文还是有相当水平的。父亲喜欢喝茶，尤其喜欢喝家乡六安瓜片和杭州的龙井，这是他仅有的“浪费”。

父亲年轻时，经济上相当拮据，在为生活、学业奔波时，往往是一碗米饭，一杯开水，佐以一块榨菜。一件旧长衫，也是洗了染，染了洗，实在不能穿了，才买一件新的。父亲有一套质地不高明的“西服”，这是在天桥估衣摊上买来的。他穿了这身衣服很得意地说：“这上面并没有天桥地摊上的‘幌子’，穿这身衣服置身于西服朋友当中，也显不出寒酸。”父亲的这种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他的衣食从不比我们这些孩子高，也从没有吃过“小灶”。他的工作忙，有时回来晚了，绝不叫人为他另作什么，有剩的就吃剩的，没有剩的，一碗蛋炒饭，一碗青菜汤，就很满足了。父亲的写作，每次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二点，为了不打搅我们睡觉，他不让家里人为他作夜宵。每逢门口晚上卖熟食的过来，他总是二两花生米，两个烧饼，就打发肚子。偶而买一块熏鱼，四两酱肉，那就算是奢侈的了。

父亲也偶而带我们吃个小馆，那总是家里的喜庆日或领了一笔稿费之后。他让我们每人点一个自己喜欢的菜，当看到我们风捲残云般的饱啖起来，他坐在一旁，怡然自乐。

爹爹（我们家乡称祖父为爹爹）早逝，奶奶三十六岁居孀，父亲是长子，当时只有十七岁，下面还有五个弟妹，而最小的姑姑还不到两周岁。爹爹的去世，给父亲的打击极大，丧失了经济来源，使父亲过早的就担负赡养奶奶和照顾叔叔姑姑的责任。他为了自谋生路，求学是时断时续的，他自知失学的痛苦，就尽力供给叔叔姑姑们上学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帮助他们成家。所以叔叔姑姑对父亲都是极其尊敬的。父亲对奶奶更是尊敬已极，在朋友当中是有名的孝子，他常对我们说，奶奶青年居孀，抚养他们兄妹六人成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每逢奶奶偶得小恙，父亲都是衣不解带的昼夜侍奉。然而奶奶的去世，正是父亲患脑溢血卧床不起之时，所以母亲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父亲。多年之后，父亲逐渐恢复健康，才知奶奶已在故乡逝世，他悲悯之余，觉得自己未能亲去安葬，很为不安。所以每逢过年就按家乡的习俗祭敬一下，以释哀思。

父亲常到旧书店去买书，旧书店的主人，有了一些文史书，也经常到家里来向父亲推销。六十年代，书店的主人又到我家来了，这一次不是来卖书，而是来买书。他们出了较高的价钱，要买父亲的《四部备要》。父亲不肯卖，他说：“我一生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什么，只有这些书。留给孩子们作个纪念，如果孩子们不需要，就捐给国家。”父亲的书，是留给我们仅有的“财产”。

父亲有一个“新春试笔”的习惯，每年的除夕作诗，元旦作画。这个习惯除了因病中辍三年，他一直保持到去世。父亲曾在一九六〇年写了一首元旦示儿诗：

照眼梅标岁月赊，文章老去浪淘沙。
涉园须解怜花草，敬祖才能爱国家。
手泽无多惟纸笔，心铭小有起云霞。
一鞭追上阳关近，莫让前程绿影遮。

父亲在这首诗里，让我们尊敬长辈热爱祖国。我留给你们的只有笔和书，希望你们快马加鞭的努力学习，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多作一些贡献！

游 西 北

一九五六年，全国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西北旅行团，邀请父亲参加。父亲虽然是病后之身，行动不便，但能够旧地重游，还是欣然愿往的，便愉快的接受了邀请。同行的成员有冯至、朱光潜、钟敬文、常任侠、孙福熙、周怀民、周元亮、陶一清、张文新等。他们一行人参观访问了西安、延安、兰州、敦煌等地。

解放前，父亲曾只身旅游了一次西北，那是一九三四年春天的事。那一次的西北行，给父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一面赞叹我们民族发源地山川的壮丽伟大，一面又耳闻目睹了西北人民当时的人间地狱生活。旧中国的西北劳动人民，在军阀混战，刀兵掳掠，天灾人祸的侵袭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卖儿卖女是常见的事，街上的饿殍随处皆有，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西北的壮丽河山，也变成了赤地千里，黑雾漫漫。这一切惨不忍睹的景象，使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震惊，他的思想和文字，经此一行，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父亲为此写了一本《燕归来》的小说，书的开头有几首竹枝

词,说明了当时西北的情况,下面是其中的几句: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
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

*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②;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

*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③入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父亲初到西北时,颇引起当地某些政要的注意,他们不知道父亲此来是何目的,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个穷书生,怎么会只身跑到当时贫穷不毛之地的西北去。虽然父亲一再解释,到西北是为搜集小说材料的,但也很难使他们相信。幸亏当时在西北的邵力子先生给父亲帮了很大的忙,父亲和邵先生是几十年的朋友,同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了解父亲的真意,给父亲作了很多解释工作。杨虎城将军又亲自陪同父亲参观了不少的地方,并且和父亲合影留念。当人们真正了解父亲是为了民间疾苦而来,自然得到了不少热心人士的协助,有的人亲自到旅馆和父亲长谈,介绍西北人民的痛苦,有的人送来各种各样的书面材料和碑帖,父亲非常受感动,而且认识了不了新朋友。父亲从西北回来,除写了《燕归来》,还写了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西天》。

① 麸:喂牲口的饲料。

② 清将左宗棠镇守西北时,种植不少杨柳,荒年时灾民即以树皮充饥。

③ 武功:地名,属陕西省。

父亲这一次游西北十分兴奋，解放后西北面貌的改变，使他由衷的喜悦。西安、兰州楼房林立，马路如网，铜川、玉门建设一新，生机勃勃，农村是绿畴无涯，麦香飘溢，敦煌宝库的艺术珍品得到了修复，光彩照人。和三十年代的西北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两相对照，使他百感丛生。父亲回来后，写了数万字的游记《西北行》，描述了他的观感。刊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同时他还写了多首诗、词，选其一首：

门后青青万树枝，门前渭水涨天池；
阡成霞彩三千道，正是斜阳欲落时。

旅行团在兰州时，有一次因参观误了吃饭的时间，他们走进了一家饭店，饭店已经打烊，不接待顾客了。同行的一位朋友问父亲：这是你写《燕归来》时没遇到的事吧！店中一位老同志听到了就问父亲：“您从北京来吗？是姓张吗？”谈了几句，老同志说：“张先生是稀客，要吃饭，有有有。”想不到这次巧遇读者，竟让一行十几人饱餐了一顿。

愉快的晚年

一九四九年初夏，父亲正为我们辅导英语，突然发音不清楚，站起来摇摇摆摆的走不稳，我们急扶他到躺椅上，躺下时已人事不知了。

经医生检查，确定为脑溢血，右半身不遂。父亲从昏迷中醒来时，丧失说话能力，记忆力遭到破坏，竟连母亲都不认识了。父亲的一生除去了书，毫无积蓄。正在我们焦虑万分之际，党和人民政府派人来看望父亲，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一次代表大会”，并聘请父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顾问，对我家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

父亲能够安心养病，健康恢复得很快。两个月后“哑哑学语”，三个月后学习行步，到能坐下时，他用不灵便的手，“学习写字”，练书法，不到半年，就可以出门看朋友，不到一年就可以写诗，记忆力也逐渐恢复。医生和老朋友，都认为父亲恢复得这样快，简直是“奇迹”！

一九五四年，父亲开始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他病后的第一部小说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先连载于香港《大公报》，颇受海外华侨的欢迎，东南亚各中文报纸都纷纷转载，后来北京、香港都出了单行本。一九五五年父亲又只身回到故乡安徽旅行，并游历了上海、南京等地，他把旅行见闻写了一篇数万字的游记《南游杂志》，刊在香港《大公报》上。当父亲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后，便辞去了文化部的顾问职务，专事创作。从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父亲为国内外读者写了《孔雀东南飞》、《白蛇传》、《记者外传》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一九五七年，全国文联委托老舍、赵树理两位前辈和父亲主办大众文艺刊物，后来刊物因故未能办成。

父亲还应中国新闻社之请，为海外侨胞报导北京各城区的变化。父亲为了写好这些报导，亲自跑遍了北京“里九外七”的十六个城。他为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无比的喜悦。父亲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参加了一九五七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一个普通作家，以久病之身，能参加这些重要活动，使父亲很感动。

一九五九年，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虽没有完全丧失写作能力，但提笔已经很困难了。周总理得知父亲的病情后，便聘请父亲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对父亲的生活也作了具体安排。文史

馆馆址在北海公园内，座落在太液池北岸的一个幽静的院落里，原名“养心斋”。进馆的老人，须在六十岁以上，所以父亲以六十四岁高龄进馆，还算“年轻人”。馆内人材济济，琴棋书画的各路高手，云集养心斋，每星期活动两次，谈诗论史，依廊清谈。每年春节，国务院都由一位副总理出面，邀请老人们聚餐，嘘寒问暖，关怀备致。

父亲和许多馆员都有过多年交谊，如章士钊、叶恭绰、陈云诰、邢端、陈半丁等先生，旧雨重聚，格外愉快。章士钊先生四十年代在重庆读了父亲的《水浒新传》后，写了一首七律送给父亲，一九六一年老话重提，章先生又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父亲，父亲对我们说：章先生的字写得还是那样好。

一九六二年初夏，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文史馆老人的情况，作为新闻简报，片名似是《老人的青春》，其中有三个个人镜头：章士钊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史，康同璧先生（女）在工作，父亲伏案写作的情况。那一天，老人们不约而同的都穿上新衣服，精神矍铄的参加拍片，陈云诰、谢无量等当场挥毫，彭八百，孙诵诏等铺纸作画，十分精彩。

父亲去北海公园次数多，他的诗词描写北海公园的也不少，这些诗词反映了他晚年安详愉快的心情。

消夏杂咏

栏杆几曲夏花香，小步闲吟夜兴长。

叶落隔林闻细语，一天星露湿衣裳。（北海闲步）

月儿好是入波圆，笙管引人古渡边。

我去桥头傍水立，一轮看到四更天。（北海夜行）

南歌子 北海小游

高阁风烟隐，回廊宝带弯，悄行东路看南山，独个行来
小鸟不知还。

摘柳穿三径，随花路一湾，眼前桥隔两湖船。人去回林
紧抱水云天。

父亲的晚年生活有保障，使他能在垂老之际，尽力之所及作些工作，对此，父亲是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

父亲于一九六七年正月初七日（农历），早晨七时整，家人为他穿鞋时，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我们怀念父亲。他为人正直，是一个有民族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一个忠于本职工作的新闻记者，他对朋友诚恳坦率，在家里上孝父母，友爱弟妹，对我们爱而不溺，为我们留下了爱国、正直、好学、勤奋、朴素等美德。

仓促之间，我们用这篇交织着欢乐、哀思与缅怀的回忆，作为一瓣心香，纪念父亲八十七岁寿辰。

1981.5. 于北京

张恨水先生小说创作年表

编号	创作年代	书名	发表报刊
		小 说	
△ 1	1919年	《真假宝玉》(短篇)	上海《民国日报》
△ 2	1919年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短篇)	上海《民国日报》
3	1920年	《皖江潮》	芜湖《皖江报》
△ 4	1924年	《春明外史》	北京《世界晚报》
5	1925年	《新斩鬼传》	北京《世界日报》
6	1925年	《京尘幻影录》	北京《益世报》
7	1926年	《荆棘山河》(中篇)	北京《世界日报》(未完)
△※ 8	1926年	《金粉世家》	北京《世界日报》
9	1926年	《交际明星》	北京《世界日报》(未完)
10	1926— 1929年	《天上人间》	北京《晨报》、无锡《锡报》同时载, 未创作完
△ 11	1926— 1929年	《满城风雨》	北京《新晨报》
△※ 12	1929年	《啼笑因缘》	上海《新闻日报》
13	1929年	《战地斜阳》(中篇)	北平《世界晚报》
△ 14	1929年	《斯人记》	北平《世界晚报》
15	1929— 1930年	《鸡犬神仙》	北平《新晨报》(未写完)
△ 16	1930年	《春明新史》	沈阳《新民晚报》
△ 17	约1930年	《剑胆琴心》	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
		(注: 此篇转载时易名《世外群龙传》, 出单行本时再用《剑胆琴心》)	

编号	创作年代	书名	发表报刊
△※18	约1930年	《银汉双星》	北平《真光影院画报》
19	1931— 1932年	《别有天地》	上海《红玫瑰杂志》
△※20	1931— 1932年	《满江红》	(单行本, 未连载)
△※21	1931— 1932年	《落霞孤鹜》	(单行本, 未连载)
△※22	1931— 1932年	《美人恩》	(单行本, 未连载)
△※23	1931— 1932年	《黄金时代》 (注:《旅行杂志》转载时易名《似水流年》, 出单行本时 用此名)	沈阳《新民晚报》
△24	1931— 1932年	《太平花》	上海《新闻报》
△25	1931— 1932年	《弯弓集》	《北平日报》
△26	1931— 1932年	《热血之花》	
27	1932— 1934年	《水浒别传》	北平《新晨报》
△28	1932— 1934年	《东北四连长》 (注: 此篇出单行本时改名《杨柳青青》)	上海《申报》
29	1932— 1934年	《换巢鸾凤》	上海《申报》
△30	1932— 1934年	《啼笑因缘续集》	(单行本)
△※31	1932— 1934年	《现代青年》	上海《新闻报》
△32	1932— 1934年	《秘密谷》	《旅行杂志》
△※33	1932— 1934年	《欢喜冤家》	(单行本, 后改名《天河配》)
34	1932— 1934年	《第二皇后》	北平《世界日报》, (未写完)

编号	创作年代	书名	发表报刊
△35	1932— 1934年	《过度时代》	山西《太原日报》
△36	1932— 1934年	《燕归来》	上海《新闻报》
37	1932— 1934年	《小西天》	上海《申报》
△38	1932— 1934年	《如此江山》	《旅行杂志》
△39	1932— 1934年	《北雁南飞》	北平《晨报》
40	1932— 1934年	《锦片前程》	上海《晶报》(未写完)
41	1935年	《艺术之宫》	上海《立报》
42	约1933— 1935年	《旧时京华》	南京《新民报》(未写完)
△43	1935年	《中原豪侠传》	《南京人报》
44	1935年	《鼓角声中》	《南京人报》(未写完)
△45	1936— 1938年	《平沪通车》	《旅行杂志》
46	1936— 1938年	《天明寨》	南京《中央日报》
47	1936— 1938年	《风雪之夜》	南京《中央日报》(未写完)
48	1936— 1938年	《屠沽列传》	《南京新民报》、《武汉日报》 (未写完)
49	1938年	《疯狂》	重庆《新民报》
△50	1938年	《冲锋》	重庆《时事新报》
(注：此篇出版单行本时改名《巷战之夜》)			
51	1938— 1939年	《红花港》	香港《立报》
52	1938— 1939年	《潜山血》	香港《立报》(未写完)

编号	创作年代	书名	发表报刊
53	1938— 1939年	《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	《立煌晚报》(未写完)
54	1938— 1939年	《游击队》	《申报》汉口版
55	1938— 1940年	《雁来红》	《昆明晚报》(未写完)
△ ※56	1938— 1940年	《夜深沉》	上海《新闻报》
△ ※57	1938— 1940年	《秦淮世家》	上海《新闻报》
△58	1938— 1940年	《水浒新传》	上海《新闻报》
△ ※59	1938— 1940年	《大江东去》	香港某报
△60	1938— 1940年	《石头城外》	
61	1939年	《敌国的疯兵》(中篇)	重庆《新民报》
△62	1939年	《八十一梦》	重庆《新民报》
△63	1941— 1944年	《偶像》	重庆《新民报》晚刊
△ ※64	1941— 1944年	《牛马走》 (注:此篇出单行本时改名《魍魉世界》)	重庆《新民报》
△65	1941— 1944年	《第二条道路》 (注:此篇出单行本时易名《傲霜花》)	重庆《新民报晚刊》
△66	1941— 1944年	《蜀道难》	重庆《新民报晚刊》
△67	1941— 1944年	《负贩列传》 (注:此篇出单行本时改名《丹凤街》)	《旅行杂志》
△68	1945年	《虎贲万岁》	(单行本)
69	1946年	《巴山夜雨》	北平《新民报》
△70	1946年	《纸醉金迷》	上海《新闻报》

编号	创作年代	书名	发表报刊
△71	1947年	《五子登科》	北平《新民报》1956年续完
72	1947年	《雾中花》(中篇)	北平《新民报》
73	1947年	《一路福星》	《旅行杂志》(未写完)
74	1947年	《岁寒三友》	《唐山日报》(未写完)
75	1947年	《雨淋铃》	上海某报(未写完)
△76	1948年	《玉交枝》 (1949年转载上海《亦报》,因病由别人整理收尾)	上海《新闻报》
77	1948年	《人迹板桥霜》(中篇)	1950年上海《大报》转载
78	1948年	《马后桃花》	(未写完)连载何报待查
79	1948年	《开门雪尚飘》 (1950年上海《亦报》转载,改名《贫贱夫妻》)	北平《世界日报》
80	1948年	《步步高升》	北平《新民报》(未写完)
81	1948年	《赵玉铃本记》	连载何报待查
△82	1953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	香港《大公报》
△83	1954年	《秋江》	香港《大公报》
△84	1954年	《白蛇传》	
△85	1954年	《牛郎织女》	《中国新闻社》
△86	1955— 1957年	《孟姜女》	
△87	1955— 1957年	《孔雀东南飞》	上海《新闻日报》《中国新闻社》
88	1955— 1957年	《记者外传》	上海《新闻日报》上集写完
△89	1958— 1959年	《磨镜记》	中国新闻社
90	1958— 1959年	《逐车尘》	中国新闻社

编号	创 作 年 代	书 名	发 表 报 刊
91	1961— 1968年	《重起绿波》	中国新闻社
92	1961— 1968年	《男女平等》	中国新闻社
93	1961— 1963年	《凤求凰》	中国新闻社
		散 文 集	
1	1948年	《山窗小品》	1945年出单行本
2	1948年	《水浒人物论赞》	1946年出单行本

说明：① 未注明“中篇”、“短篇”者，均为长篇小说。

② 有△号者，为已出单行本者。

③ 有※号者，为已拍成电影者。

张晓水 张二水 张 伍搜集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YaZ5L2c55Sf5rav5Zue5b+GXzEwMTlyMDg1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5199\u4f5c\u751f\u6d4f\u56de\u5fc6_10122085.zip",
  "filesize": 10321329,
  "md5": "b237137a6dac748c3958a0591f08236a",
  "header_md5": "5dc611427c579b00488eba47dbacc2b4",
  "sha1": "2b858c0823f314522a945f12ec57b8e99dd62963",
  "sha256": "8332fb90c5eb4ddab3c87137310c94a9ecf5e01b81703e5d2d6852b531d61af5",
  "crc32": 5312352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0659335,
  "pdg_dir_name": "\u2568\u2524\u256b\u2248\u2554\u00b7\u2564\u2500\u2557\u256a\u2565\u03a3_10122085",
  "pdg_main_pages_found": 162,
  "pdg_main_pages_max": 162,
  "total_pages": 169,
  "total_pixels": 650487657,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